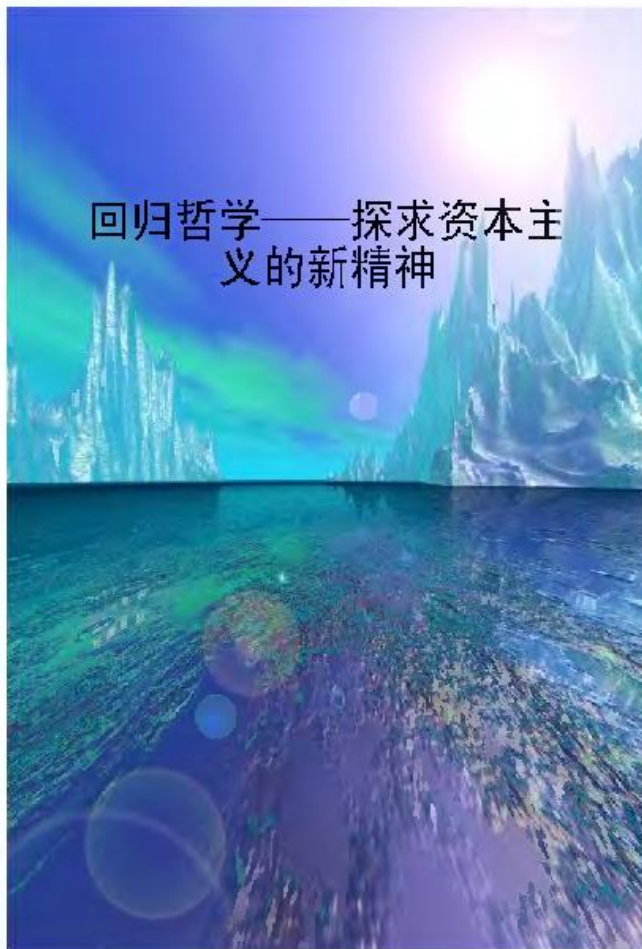


回归哲学——探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回归哲学

——探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日] 稻盛和夫 梅原 猛 著
卞立强 译

学 林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周剑峰

回归哲学

——探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日]稻盛和夫 梅原猛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 插页 4 字数 108,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10,000 册

ISBN 7-80616-225-9/B·12

定价:6.50 元

目 录

序 章 在混乱中我们应当做什么？

——稻盛和夫	1
为什么日本人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	1
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差异	3
在日美经济摩擦中，日本说了“不！”	6
没有亲切就没有生存资格	9
高贵者应具有的价值观	12
通向幸福的道路	14

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伦理与独立自主的精神

——稻盛和夫、梅原猛	17
苏联的解体所带来的影响——梅原	17
资本主义所寻求的伦理——稻盛	18
把追求利润变成自身目的的资本主义——梅原 ..	21
实业人士必备的四个条件——稻盛	23
要求利他精神的时代——梅原	25
产业人士可以当作圣经的话——稻盛	29
严重的问题是独立自主的人越来越少——梅原 ..	31
“胳膊拧不过大腿”成不了民主社会——稻盛	32

“以和为贵”的真正意义——梅原	33
拘泥于“自己的利益”就不可能看到前景	
——稻盛	36
空海传来的大日如来的视点——梅原	37
“纯真”是成就事业不可缺少的动机——稻盛	38
用50年的幅度来看事物——梅原	40
反思“动机是否善、有没有私心”——稻盛	41
有没有忍受孤独的力量——梅原	42
先驱者的条件——稻盛	44
第二章 共存的哲学与循环的思想	
——稻盛和夫、梅原猛	46
文明危机的警钟——稻盛	46
经营者也需要有文明论——梅原	47
摆脱“恋母情结”文明——稻盛	49
“自然是人的奴隶”的误解——梅原	50
共存与竞争——稻盛	52
“进化论”和“分栖理论”——梅原	53
让人实际感受到地球的平衡的“玻璃球中的世界”	
——稻盛	55
现在是建立“新秩序”的前夕——梅原	56
良知、良心一定会觉醒过来,回避危机——稻盛	58
对环境问题作出国际贡献,比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更为重要——梅原	59
有无自愿牺牲的觉悟——稻盛	61
构筑循环型工业社会——梅原	63
人的思想确实在变——稻盛	65

只要认真对待，一定会产生新的技术——梅原	68
第三章 学习过去，思考未来	
——稻盛和夫、梅原猛	71
大米的富饶与小麦的富饶——梅原	71
先人之见会使人看不到可能性——稻盛	73
被抹煞了的历史——梅原	74
技术的磨炼是在实用中产生的——稻盛	77
和自然调和的文明——梅原	79
从古代文明中获得的想象力——稻盛	81
从玉器联想到现代的技术——梅原	84
访古知新——稻盛	85
古代遗迹的研究会导致未来的技术——梅原	87
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稻盛	88
不能忘记礼节——梅原	89
“善事”会有天地相助——稻盛	91
第四章 争取心灵的教育	
——稻盛和夫、梅原猛	93
为什么出现了末世的现象——梅原	93
对“专制政治”的担心——稻盛	94
对应的办法只有建立“新的资本主义”——梅原	96
不撒谎是最起码的道德——梅原	98
不撒谎的智慧——稻盛	100
痛感“心灵教育”的必要性——梅原	102
偏向智育的教育的积累带来了混乱——稻盛	103
“心灵教育”不是国家主义的道德——梅原	104
需要有包括心理学、宗教和伦理的綜合的德育	

——稻盛	105
培养没有道德感觉的知识分子的后果	
——梅原	108
“心灵教育”对解决环境问题也是重要的	
——稻盛	110
坚持自己的欲望就不可能和他人共存	
——梅原	113
学术的领域应当开放——稻盛	114
人生最高的奢侈——梅原	116
建立的资产不过是暂时的寄存物——稻盛	117
当前需要的三种教育——梅原	119
末 章 打开“困境时代”的办法	
——梅原猛	121
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121
探索“回归原点”的时代	122
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124
丧失道德所带来的危机	125
在身边寻求“伦理”的源泉	128
“心灵教育”的三根支柱	131
《回归哲学》读后	蒋凡 134

序章 在混乱中我们应当做什么？

——稻盛和夫

为什么日本人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

战后日本富裕了，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把我们在美国的分公司和日本的公司作些比较，就会实际感受到这一点。包括工厂的制造人员在内，平均工资日本要高得多。按1美元=85日元来计算^①，从我们在美国东海岸南卡罗来纳州的分公司和日本的公司的情況来说，日本的工资为美国的1倍。说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以工资为基准来看，日本已超过美国。

可是，日本却流行着“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这句话。说“日本的经济规模大了，日本成了经济大国，但在日本却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

从政治家到一般民众都不断地在说这样的话，因而也就不断地议论“我们应当想个什么办法”。

当然，存在着流通的结构和规章限制等等的问题。这些不恰当的地方应当修正。但是，除去这些不恰当的地

^① 这是本书两位作者对话时(1995年春)的比价。

方,日本还应当是富裕的国家。

由于衣、食、住不足而饿死人、冻死人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也不是非得要像拉车的马那样每天劳动18个或20个小时才能维持生活的社会,这还不能称为“富裕的社会”吗?!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还是应当认为已经到达了“富裕的社会”。

如果同意是这样,那就等于说日本人是置身于“富裕的社会”之中,却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日本人陷入了一种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的贫穷的精神结构。他们把已经获得的富裕束之高阁,却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以外去追求什么。他们还以为有一个客观的富裕的基准,“希望有更多的富裕”,恐怕是因此才“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

所谓“富裕”,本来就是主观的东西,不会有什么绝对的基准。另外,富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地上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自己创造的。

佛教说要“知足”。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可是在现实中不知足的人却很多,所以才出现了“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的情况。

极端地说,不知足的人、永远不感到满足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感到富裕,因而也就永远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归根结底,只有“知足的人”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有了“知足”这一精神结构的主心骨,才能实际感受到富裕。

“知足”的对立面“不知足”,就是“利己”。如果是利己,那就会一心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根据是否符

合“利”的理这一基准来判断一切。这样一来就会永远不知足。而现在日本以这种利己为基准来行动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日本的社会只是根据利益得失的价值观在运转。应该说这是阻碍行政改革、缓和规章限制以及地方分权的最大的原因。习惯于既得权益的人对于改革总是绝对反对的。出租汽车行业仅在本行业内团结一致，不准新人加入，不断地提高车费。私营铁路仅由他们自己去同运输省^①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运费。政治家则企图根据本党的利益和策略来指导政治。这一切都是利己的行为，根本没有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他精神”和“爱”。

不仅是行政改革的受阻和规章限制的缓和，就连政治的混乱、泡沫现象及其崩溃的产生，以及股票行市呆滞、金融不正常条件、日美经济摩擦、国际问题等日本的一切混乱，我认为都是产生于日本人非常缺乏伦理和哲学。

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差异

佛教教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弟子问和尚说：“您说有地狱和极乐世界，还说地狱里有阎王爷，让人们遭受极大的痛苦。可是，地狱和极乐世界是怎么不一样呢？”和尚回答说：“这是因为世上

^① 日本中央政府的一个部，相当于交通部。

有坏人，所以作了一些夸张的说法，警戒他们如果干坏事就要下地狱。实际上地狱和极乐世界在物质条件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是完全相同的。”弟子听了这话当然大吃一惊，反问道：

“听说地狱里有阎王爷，还有什么血海；极乐世界有花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吗？”

“完全一样。”

“那么，地狱和极乐世界哪儿不一样呢？”

“那是住在那儿的人们的心不一样。地狱是有着要住地狱的心的人们居住的地方，极乐世界是有着要住极乐世界的心的人们居住的地方。

“打个比方来说吧。你也知道，我们寺院里一年要吃几顿美味的面条。对于修行的和尚来说，面条是一年只能尝上几次的好饭。像面条这样的好饭在地狱和极乐世界里会有什么不同呢？”

“一般是燃起柴火，在大锅的沸水里把熟面条咕嘟咕嘟地焯一焯，然后各人用一米来长的筷子捞起焯好的面条，蘸着汤汁来吃。

“在这一年仅有几次好饭的日子，那些饥肠辘辘的家伙，早就围在大锅的四周摆好了阵势。就等着说‘可以吃了！’如果是地狱，那些坠进饿鬼道的家伙都想争先插进筷子来吃。一旦有人捞得很多，对面的人就以为面条尽叫那人捞走了，自己的一份没有了，于是就用自己的筷子拉下那人捞起的面条。这一边在这么闹腾，另一边已有人捞起适量的面条就要吃了。汤汁已蘸好了，但筷子太长，送不进嘴里。因此有人想把面条放下来吃，于是又有人想夺

过放下的面条来吃。

“由于这么互相争抢，所以谁也吃不上面条。因为自己吃不上，就有人出来阻挠能吃得上的人。于是到处发生了争吵。正在这么闹腾的时候，锅翻了，面条撒了满地，谁也进不了口。由于进不了口，气氛更加紧张。最后竟用筷子插入、打人，发出阿鼻地狱似的悲鸣。

“另一方面，如果是极乐世界的话，一听说‘可以吃了’，则把自己捞的面条放进前面的人的汤汁里说：‘请您先吃吧！’让别人先吃。而对方也让自己吃，说：‘这么好吃的东西让我先吃，太感谢了。您也请吃吧。’就这么互敬互让，大家都吃上了面条。

“这样平静而和善的人们居住的地方就叫作极乐世界。‘我、我’地仅考虑自己的人们居住的地方就叫作地狱。”

这里我感到好像是借地狱来谈现在的世态。包括新兴宗教在内的事件、泡沫经济崩溃的现象、政界的变动等等，都是“我、我”地热衷于利己的人们居住的世界所发生的现象。过头的日元升值、贸易摩擦全都是如此。这是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心制造出来的。那里有锅，在那里煮着面条，还有筷子——仅有这些是事实。制造出阿鼻地狱似的悲鸣，是住在那儿的人们的心。

现在日本的这种世态，也是现在住在那儿的日本人的心制造出来的。因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心清洗干净，如果说古代的伦理好，那就用它来净化心。如果有了以美丽的心为行动规范、为判断基准、为价值观的人，这种世态也会改变的。本书的最大的主题，就是要在我们的

身边重新构筑可以成为这种人心的规范的东西。

在日美经济摩擦中,日本说了“不!”

让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日本来看一看。

1995年6月,在日美一揽子协议的汽车零部件的谈判中,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一度陷于谈判破裂的状态。而日本方面仍然强硬地说:“该说的话就要说。”弄成甚至会影响到安全保障问题的僵硬关系也没有让步。对此,有的人发表感想说:“说得好!”有的意见认为:“永远追随美国的外交是不正常的。”“战后50年了,我们也应该自立了。”不过,我在这里感受到的并不是要自立的国家的信心,而是利己的傲慢。

看一看以前日本的外交,令人注目的是始终很无信心的态度。

例如和韩国的谈判是如此,和北朝鲜的邦交正常化的问题也是如此,和中国的交往、和台湾政府的交往也都是这样。所有的商谈都好像是触及到肿包似地谨小慎微。

另外,关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所提倡的EAEC(东亚经济会议),日本也顾虑美国的意向,始终抱消极的态度。马哈蒂尔首相发了急,说出了“希望日本拿出更多的勇气”的话。因为一提出“亚洲是一体”的主张美国就不高兴,所以日本是决不会回答说“干吧”。

再拿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来说,日本不是堂堂正正地宣布“我要进入”来进行活动,而是采取“如果可能,希望大家来推荐”的态度。而且一方面期待别人推

荐。另一方面又说：“PKO(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不能派出自卫队，但希望能设法获得准许。”附加了这样的条件。内心里是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但自己不举手，盼望别人来说：“请加入吧！”推着自己进去。从旁观者来看，这是一种没有信心的人所采取的态度。

这样的日本竟然采取了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决裂也在所不惜的态度。这种“信心”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

据我看，其背景大概是美国的主张和根据通商法301条款发动制裁违反自由贸易的精神，即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这一论理。为了维护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世界各国会聚一堂成立了WTO，其条文中明文规定不得进行单方面的制裁。美国不管这些，摆出通商法301条款，对日本进行制裁。这当然没有道理，我想日本有理由认为这是违反自由贸易的精神，其论据有合理性。大概日本因此而产生了信心，终于同美国争吵起来。也就是说，在自由贸易这一大义名份下，美国在论理上有矛盾，日本在论理上可以主张自己的合理性。在论理方面日本产生了信心。

美国在汽车零部件谈判中确有令人不可理解的地方。美国是要人更多地购买它的汽车零部件。汽车的零部件的质量极其重要，另外价格是否合适，能不能按期交货——仅就这三点来看，就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交易，现在硬逼着人“买、买！”显而易见是不讲理的。

另外，美国的汽车公司在日本出售右驾驶盘的车是两年前才开始的，在此以前只有左驾驶盘的车，自己又不努力建立经销店网。以前是完全委托给外国车专门代销

店,现在销售不出去,要求“开放经销店网”。这也是令人费解的。这些事例一一地列举起来,微小的不讲理的地方也是很多的。

但是,日美贸易收支中日本的黑字高达五百几十亿美元,其中近2/3是因汽车产生的。也就是说,日本的贸易黑字中约三百多亿美元是有关汽车的出超。日本的汽车厂商进入美国,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和努力,拼命地制造,拼命地贩卖。除了它在美国国内制造的部分外,仅日本出口的部分就有300亿美元的差距。因为日本的企业一向非常努力,所以能销售出去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理由可以成立,但造成巨额的对美黑字,我认为这不是说一说“你们在日本没有努力,卖不出去是当然的”就可以了事的问题。

对于日本要“向WTO申诉”,欧洲说“美国不合道理”,美国国内也有人说“美国不合道理”。但是,因此而挺起胸膛说“我们有理!”我认为这是极其危险的态度。理是有理,但世界各国并没有全面地支持日本。谈判如果没有结果,陷入长期的争执,最后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道理也许是这样,但日本(在贸易黑字上)一人得利是不合理的。”即要受到全世界的指责。

根本问题是日本一人得利,一点也不分给别人,所以美国才有意见。关于这个问题,世界的舆论不可避免地会认为:“日本受点欺侮是应当的。”日本政府究竟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

没有亲切就没有生存资格

日本在对美贸易谈判中还提到企业的努力。也许日本企业确实在美国拼命努力了。但不能忘记接受它的土壤是在对方。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国不一样，有些地方是很难从外面直接进入的。美国一说日本是“排他性的异质的国家”，日本人立即否定说：“不是这样。”但我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是异质的国家。

比如说，进餐馆就有事先没有定价而听凭餐馆计价的饭菜，这在全世界恐怕只有日本一家。如进高级寿司店，坐下来之后，并没有标明定价的菜单。你要问“多少钱？”那就被看作乡下佬，必须不知道价格就订饭菜。而且临回去时会递给你一张价格吓人的账单。与日本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就连带把的盛生啤酒的玻璃杯上也有刻度。特别是盛烈性威士忌，连小酒杯上都有刻度。玻璃器皿上刻上度数，这在欧洲是一般的常识。从这样的社会来看，尽管这只限于高级店，但还是认为非要人家说“一定要标出价格”的社会，是不可能做正经买卖的。我们已经在这个社会泡久了，感觉不到什么异质，但从美国来看，使他们感到不满的地方到处都有。

再拿汽车加油站来说，从批发店买进石油时，价格是不固定的，要等以后再补算，这种购进的方式至今还通用。就是说，购进的价格不知道就以1升105日元或100日元的价格卖出去。如果以后批发店要你1升120日元，那就大亏本了。但是，批发店说：“不会让你吃亏的！”加油站是

信了这句话在做生意。

还有更奇怪的行业。报纸上登过这样的事：超级市场等所使用的聚乙烯袋子的原料的价格，是交出制品让人使用之后6个月，才根据裁决来决定。购进原料进行制造，在不知道多少价格才能卖的情况下就卖出去，以后才决定原料的价格——这种事简直使我难以相信，但据说这是一种划定势力范围的战略。总之，价格在买之前决定，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A多少钱、B多少钱、C多少钱，价格规定好了，我才买。”所以现在暂不决定价格。而说：“听我的吧，不会让你吃亏的。”做的是一种“价钱以后再说”的买卖，这等于是否定了竞争。

在大的企业中也有一些奇怪的事。例如旧财阀系统汽车制造厂家的一些高级车，直到最近还只能看到在该企业集团内有人乘坐，这是怎么回事呢？

与财阀系统企业有关，直到最近，只喝同一企业集团内的啤酒仍是天经地义的事。到餐馆公开地说：“有没有A啤酒？”“没有我就到别处去。”这样的事明里暗里都存在，所以怎么考虑也很难说日本市场是公平的。拿汽车来说，日本说：“日本的汽车市场是开放的。其证据是海关不要税。要建立经销店网也没有任何歧视。”但和美国的市场还是有所不同，总觉得有一种封闭性的氛围。

仅在15年前，日本一直一心一意地扶植国内产业。不但是通产省的行政部门，就连农业、水产业、运输业等各个部门都强调“我国的产业”，专心于明治维新以后的富国强兵中的“富国”——即“使国家富起来的政策”。由于有这样的经过，尽管说日本企业已经强大起来，实际上也

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日本是在这样的庇护下成长的，所以才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美国由于疲弊了，一个劲地说：“希望给想点什么办法。”对于美国的这一要求，日本能说一声“咱们想点什么办法吧！”也不会遭到报应的。如果是只要自己合适就好的利己的伦理观，那是另外的问题。如果能具有稍好一点的伦理观，说一说“承蒙购买了许多日本的产品，我们因此而赚了钱，我们也买点什么吧”，给予这么一点亲切，不是完全应该的吗？

美国被迫盛气凌人地挥舞起通商法301条款，一半原因也是由于它处于屈辱的状态。情况是这样，而你口若悬河，说自己有理，硬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值得赞扬的。这是一种没有亲切关怀的、完全是利己的对付办法。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

“男人不坚强就活不下去，但是，没有亲切就没有生存资格。”

由于努力而强大起来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关怀弱者的心，作为一个人来说也是缺少魅力的。对弱者伸出援助的手，比如说有人有了困难，把自己的事往后放一点，先去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样的亲切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亲切关怀就是“利己”。日本想当常任理事国，没有人赞成是必然的。仅仅因为是财主，有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中是“没有生存资格”的。

高贵者应具有的价值观

真正的信心不是由懂不懂道理来决定的。以一个人所具有的哲学、人生观、价值观为根据而产生的信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心。我认为这可以说是立足于形而上的世界观、伦理、哲学等普遍性的价值基准之上的信心。对于有着这样的信心并付诸行动的人，人们的反映是表示敬意和尊敬。相反，没有普遍性的价值基准的人的信心，只不过是令人讨厌的傲慢。

遗憾的是日本欠缺真正的信心，所以不得不只依靠有没有利、论理上有没有矛盾这些知性的作用，难以摆脱傲慢不逊的形象。

英国的贵族有所谓“Noblesse oblige”(高贵的身份应尽高尚的义务)。就是说，贵族之所以获得很高的地位，受到大众的信赖和尊敬，那是因为他们从不卑怯，在战斗等非常的场合，有自我牺牲的勇气；有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觉悟。这里显示了一个明确的基准是，在战场上临阵脱逃的人就不是贵族，就不能信赖和尊敬。

处于高尚地位的人，本来就应当具有值得尊敬的伦理观、哲学和价值观。可是，现在丧失了这种形而上学的价值观，仅仅具有极其庸俗的判断基准的人却占据了日本的核心地位。他们仅仅具有赚不赚钱、合不合理这样水平的判断基准，所以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们的发言都不会受到周围的人点头首肯，大家都不会附和他们说一声“说得好！”因而日本只好左顾右盼，按照随大流的方针

行事。

这不仅是就外交而言，从日本国内来看，同样具有真正信心的人，不是根据庸俗的判断基准，而是具有值得尊敬的伦理观、哲学、价值观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人们常说官僚是“有省没有国”、“有课没有局”^①，他们考虑的只是利害得失。拿经营者来说，就每一个企业家来说，不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吗！？

日本人的这种精神的贫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从战后才出现的。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就已经丧失了武士道，出现了非常卑劣的日本军人。如果有武士道的精神，就不会容许这种卑劣。那么，武士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我认为在江户的元禄时代^②就已经露出衰退的征兆。赤穗浪士的报仇故事登上歌舞伎舞台，人们纷纷谈论“忠臣藏”^③，那就是对已经丧失的武士道的赞美。

从那时起在太平中到达了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后进入近代，然后经历了日清、日俄战争。我认为这时候真正的武士道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恢复了“装模作样的武士道”。因为是装模作样，一旦在近代战争中连战连捷，就忘记了这种精神，彻底变成天狗^④了。其结果，日本的陆军、海军中出现

① 日本的行政机构是中央政府设省(部)，下面有局、课等。

② 指江户幕府中期第5代将军德川纲吉当政的时期。当时东山天皇的年号是元禄(1688—1703)。

③ 忠臣藏是说47名武士(即赤穗浪士)为主人报仇雪耻的故事。最初是戏剧，后来又改为小说、电影等出现。

④ 一种想象的怪物。现在一般用作骄傲自大的人的代名词。

许多没有“心”的军人，陆军省、海军省中都把自身的安泰放在首位，互相庇护，从而导致危及国家的命运。

本来，即便是自己的上司、自己的同僚，有了错误，就要严厉地追究；作战有了错误，也要彻底地查明，这才是承担一国之安全保障的军人负责的态度。这样也许会大吵大闹起来，会使对方受到降职的处分，即使招致使朋友垮台的后果，也必须要彻底追究失败的原因。可是，战前的日本，由于过分重视友谊这一世俗的感情而误国的事多不胜数。

结果，日本自战国时代^①以来，在内部持续保持了和睦共处的状态，在明治以后仍然留下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高尚的伦理观，领袖应当具有的伦理观。

通向幸福的道路

不论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当唤起“为他人、为社会”的利他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并根据它来行动和思考。同时我也感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日益加深混乱的不只是日本。比如美国，离婚增多，家庭崩溃，学校教育，特别是公立的中小学教育一直在走下坡路。崩溃的不只是共产主义的苏联，其实资本主义社会也荒废到了崩溃的边缘。

以前支撑形而上学的价值观的是宗教。现在这种宗

^① 指织田信长统一日本全国、各地藩主各自为政、互相攻伐的时代(1477—1573)。

教也在衰退。基督教在欧美已经大大地衰退了，日本已有的宗教已变成冠婚葬祭的经营者，没有力量重新建立伦理观。所以我们不能依赖宗教。

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一件事给了我一点启发。美国有一本题名为《通向幸福的道路》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某个人自费印刷散发的。如果某个人或某个企业对这本小册子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印刷散发。规模虽然很小，但有人正在发起这个运动。

这个《通向幸福的道路》的活动的精神虽然会消失，但我对那里提出的伦理观、价值观的性质有同感。那里所说的伦理都是过去大家说烂了的，一说大家都知道的极其普通的伦理。它大概是要给失去了权威经典的迷路羔羊提出行动的指针，提出可以成为价值观基准的最基本的准则。例如其中写道：“你的邻人会因为你的点小事而感到不愉快。这样的事不要做。”像这样简直像教小学生的事都写得很具体。而通篇令人感到的是一种“利他的精神”。

以前我们一直是把中国的古典著作等艰深的学问、哲学拿出来考虑教育。我认为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应当重新评价的对象是老爷爷、老奶奶教导我们的教训、伦理观。现在应当再一次重新树立包含着这些伦理观的利他的精神。

也许有人会认为：“现在还说这些跟小学生说的话有什么用。”可是，现在的大人连这些教小孩子的伦理都不懂。何止是不懂，甚至连想懂的意识都没有。认为这是社会颓废的原因是不会有错的。而且日本颓废的原因也是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颓废的原因。

我偶然获得了同梅原先生这样具有杰出历史观的哲学家交谈的机会。以前我作为一个平凡的经营者的，废寝忘食地从事经营和研究，并通过这些活动认真地思考过人生。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经验。在这里所谈论的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解救现在日本混乱的根本道路是什么？这同时也是探索防止现在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崩溃、文明的崩溃的办法。

通过这次讨论，我感到可以成为人类行动指针的伦理是非常简洁明了的，如同教小孩子似的伦理观。我认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单纯而又符合宇宙常理的伦理观；而且这种伦理观不会是天赋给我们的，而是必须我们每个人亲手去重新缔造的。

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伦理与 独立自主的精神

——稻盛和夫、梅原猛

苏联的解体所带来的影响——梅原

回顾今天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长期在不景气中挣扎，又遭受日元升值、1美元逼近80日元的袭击，令人感到所有的日本人都好似失去了信心。我希望能有这样停滞的氛围中谈论一下“今后日本人应当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如果这能给被停滞的空气所笼罩的日本人多少带来一点勇气和信心的话，我认为是极好的事情。

丧失信心现在正在日本蔓延。但寻根溯源，我认为其最初是开始于柏林墙的拆毁。坦率地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受过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都受过诸如社会主义社会是胜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之类的教育。可是现在明白了，本应是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也仍然存在着被压抑和不平等的严重现象。

这个被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认为立

足于马克思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发生了动摇。当然，如果能把这种理论很好地重新改组，也许会出现另外的情况。总之，我觉得曾经指导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显然具有其幻想性。

在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崩溃时，美国的政治家同时又是思想家的美籍日本人福山说：“对立的时代结束了。”正如黑格尔说哲学中的“绝对精神这一克服了对立的时代最后即将到来”那样，法兰西斯·福山也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克服了，现在“资本主义万岁的时代已经到来”。还说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感到非常高兴，资本主义的繁荣是无可怀疑的。

从那以后，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福山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的繁荣是无可怀疑的”的状况至今尚未出现。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以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东西开始逐渐暴露出来，被马克思当作缺点指出的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日益暴露在人们的眼前。

当然，尽管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已经这样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但我们日本已不可能去争取社会主义了。因为我们已经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很难说是一种理想的社会。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现代日本的最大的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想只好去考虑挽救现在资本主义阴暗面的“新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所寻求的伦理——稻盛

刚才梅原先生所说的，我想是指“正确的资本主义”。

近代资本主义是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发展的。但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所谓以人为基本的经营方式，也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吧。我并不认为追求利润就是坏事。但是现在所追求的资本主义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获得的利益用出去。我想那大概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为了人吧。但首先第一步是为了从业人员和股东，同时把利益分给顾客也是很重要的。做了这些事之后，如果还有利润的话，那就应当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为文化、社会作贡献和进行援助之用。

不过，这种有伦理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过去没有过的新东西，以前就存在过衬托着非常杰出的伦理观的资本主义。据我理解，例如在德国的马科斯·维贝尔^①所提倡的以耶稣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勃兴时代，就存在过基于严格的伦理观的资本主义。但是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这种耶稣教式的严格的伦理观逐渐淡薄了，最后变成了所谓“能赚钱就好”的状况。

本来的资本主义是争取有利于社会而运行的。所以可以考虑首先“要返回到其原点”。然后应当以此为基础，努力建造比初期更好的“新资本主义”。只是还原还不会有进步。在颓废的现在要返回到原点，暂时恢复基本的形态，然后要向“新资本主义”前进。这样一来，我想很可能会产生好的智慧，因此，我希望产业人、企业人这些资本主义的中坚人物要有更雄大的哲学。我感到这样的力量今后会日益重要。

^① 马科斯·维贝尔(1864—1920)，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另外,建立于伦理观上的资本主义不仅欧洲有过,日本也俨然存在过。在封建时代,在江户时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就有人提倡有伦理的商人的理想,并在商人们中间广泛地流传。

无须多说,江户时代有着士农工商的阶级制度,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属于最低的阶级,当时的商人大概叫人有一种“可疑可怪”的感觉。就在这样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叫石田梅岩^①的人。我想他可能是京都龟冈人。他曾在京都室町的一家绸缎铺里当伙计,经历过很多劳苦。40岁以后突然与禅僧交往,作为在家人进行过坐禅等修行,结果开悟,开办了被后世称为“石门心学”的私塾。

石田梅岩说过这样带哲学意义的话:“经商并不是卑劣的行为,作为人的行为并不是最卑下的。获取利润是很好的事。”用近代资本主义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利润”并不是罪恶。生活在封建制时代的梅岩竟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有着身份制度的时代,他认为“商人获取利润和武士领取俸禄完全一样,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鼓励商人们对于被人们认为是“可疑可怪”的商业行为要有信心,“应当进行高尚的商业竞争”。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已经萌芽。

我认为梅岩的教导中最重要的是“应当正直地经商”。他要商人们不能有卑怯的行为、不正的行为,“要有信心”,“要堂堂正正地经商”。他给商人们指出了活路,同

① 石川梅岩(1685-1744),江户中期思想家、石门心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都鄙问答》、《齐家论》、《语录》等。

时也给商人注入了伦理观和哲学——即商人之道。

我认为，和欧洲以耶稣教的伦理观为基础而产生的初期资本主义一样，在梅岩的这一时代——日本商业资本的勃兴时代，也有着比现在更强烈的伦理观。但这种伦理观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这里不能不令人感到现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在伦理观上的贫乏可怜。如果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一直继续下来，现在的泡沫经济、政界的不正常事件以及证券公司的不正常事件就不会发生。

把追求利润变成自身目的的 资本主义——梅原

正如稻盛董事长所说的那样，初期的资本主义中有过马科斯·维贝尔所说的耶稣教的精神。当时说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算盘。圣经会抑制算盘，光凭算盘来计算还带不动商业。我想还有某种伦理的抑制在起作用。

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发达起来，不知不觉地就把追求利润变成自身的目的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利润变成自身目的的资本主义。因而在资本主义的经营者都是坏人的前提下形成了理论。于是马克思认为人到了社会主义就会一下子变好。可是，制度变了人并未变好。好色的人到了社会主义还同样好色，喜欢滥用自己权力的人到了社会主义仍然滥用权力。总之，人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造的，到了社会主义，仍然会出现很坏的人。

因而日本不得不放弃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只好考虑

如何来改造资本主义。唯一的选择是重新确立资本主义在初期时所具有的伦理性。像马克思那样缔造另一种社会是办不到的，所以要把现在的资本主义伦理化。我们应当为此而作最大的努力。

谈到日本商人的伦理观，我想提一提伊藤仁斋^①这个人。他是比石田梅岩前一代的元禄时期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试图把京都的儒教伦理变为商人所有，而不是变成武士所有的儒学家。

仁斋的学说称作“古义学”。但这并不是说只是返回到过去。据我的解释，仁斋是企图创立作为平等的伦理——不是纵社会的伦理——的“商人的儒教”。也就是说，他是企图把“仁”、“诚”、“爱”这些横社会的伦理——不是把“忠”、“孝”这些纵社会的伦理——放在中心来思考儒教。因而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那就是要用儒教去感化已经由工、商组成的“町人社会”。^②我认为他在德川时代的儒学界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仁斋的学说中有趣的一点是，他认为结婚以外的性关系是不对的，但一旦结了婚，性关系就不成问题了。他的想法是，儒教完全用伦理来抑制性是不合人性的，因而在制度范围内肯定色情是自然的。他的意图是想把往往由于过分禁欲而很难成为商人的伦理的儒教教义适应于商人。而且仁斋自己就和前妻、后妻之间共生了九、十个

① 伊藤仁斋(1621--1705)，江户前期儒学家，通称原助，京都人，在京都开办“古义堂”，教授古学，弟子众多，著有《论语古义》、《孟子古义》、《童子问》等，号古学先生。

② 町人的概念，主要是指江户时代新出现的商人阶层，但也包括城镇的工匠人。

孩子。于是形成一种观点：武士之都的江户虽然没有这种传统，但京都却有这样的商人的传统。我感到石田梅岩就是从这种传统中产生的。

在伊藤仁斋、石田梅岩的时代以后，生活于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以后的福泽谕吉^①也提倡过初期阶段的资本主义的伦理。那就是独立自主的伦理。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地分开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伦理慢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赚钱了。现在混乱的世态正是宣告应当返回到其原点的时期已经到来。

实业人士必备的四个条件——稻盛

福泽谕吉的有些话，我是用心去读的。他说：“思想之深远如哲学家，心术之高尚正直如元禄武士，加上有小俗吏之才，再加上有土农民的身体，才可以成为实业社会的大人。”

这些话是福泽说明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实业社会的大人。

首先必须有哲学家那样深远的思想。还要有元禄武士那样优美高尚的心。第三是“小俗吏之才”。福泽所说的“小俗吏之才”，是指江户时代下层小官吏在袖筒里收贿的那种聪明狡诈的机灵。必须要有这种“小俗吏之才”。最后需要有农民那样“强健的身体和坚韧的意志”。福泽说

^① 福泽谕吉(1835 - 1901)，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著有《劝学篇》等。

不具备这四个条件就不可能在实业界获得成功。

我觉得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排列的顺序有些与众不同。他说第一要具有哲学家那样深远的思想，第二需要心地善良，第三要机灵，最后必须顽强坚持。我认为福泽谕吉这个人很了不起。明治维新以后，他带头跑到欧美看了资本主义社会，回到日本说欧美的实业人士是如此这般。大概当时人们的精神还是比较纯真的，所以把所谓机灵，商业才干放在第三条，而今天日本的实业人士把它提高到第一位，接着是第四条的“顽强的精神”，而最重要的“哲学”、“善良心地”却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从事实业的人应当恢复福泽所说的第一、第二条。

当然，这个问题恐怕不仅限于实业界。拿学者来说，很多人在学术领域里确有机灵的好头脑，或者在学术领域里很努力，但就缺少哲学和好心地。

脑子好，在学术上写出非常好的论文，这是很好的事，而且有的人确实很努力，但就是心术不正，没有一星点儿哲学。这样的人我知道得太多了。

就是这样的学者，非常傲慢。我们在交往时，连筷子怎么拿起怎么放下都要吹毛求疵，大发脾气。对这些人的学术水平之高，我表示佩服，也很尊敬。但是，连拿筷子的动作也有意见，这是不合情理的。当然啰，他们很傲慢嘛。我觉得这样“了不起的学者”为数还不少。

学者往往蔑视实业界，我感到其背后还是有着士农工商思想的影响。例如企业和学者之间的结合，学者方面至今仍存在着偏见。日本的大学对于和民间的结合总有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的根子恐怕是有着这样一种思

想：“我们学者是干净的，民间经济界的人们都是肮脏的家伙。怎么能让这些肮脏的家伙用金钱来玷污我们的学问呢！”

这恐怕还是士农工商的身份制认为“商”是卑劣的、“可疑可怪”的低级人物的思想所留下的残骸在作怪。它阻碍了“学”与“财”之间的协作。

刚才我介绍了石田梅岩的观点。正如梅岩所说的那样，商人得利，和官吏领取薪水或武士食禄并没有什么不同。商人得利为什么就是卑怯的呢！！为什么就是不好呢！！如果从事商业的人要受到指责，那是在其商业行为不正直的时候，或者干了不正当行为的时候。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应当受到指责。

要求利他精神的时代——梅原

您说在现代的日本，福泽谕吉所说的四个条件中已丢掉了哲学和纯真的心，按顺序来说，丢掉了一和二，只剩下三、四。对此我也有同感。

特别是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到现在这段时间，令人感到一、二两条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机灵和顽强了。有些人根本不想一、二两条，靠打高尔夫球来增强体力，打麻将将来培养机灵，然后是唱卡拉OK，……就是这样的人现在很活跃。但他们头脑空空，伦理观等于零，实在可怜。没有优美的精神就没有人品。这种状况是可悲的。

另外，在学者中也确实如您所说的那样，有的人既无哲学也无人品，却一味地骄横跋扈。不过，这种人是做不

了真学问的。也许他们可以风靡一时,但一死就立即消失了。要做出死后仍能引起种种争论的学问,我认为没有四个条件中的第一条、第二条是做不到的。

此外,所谓学者的人品,这和稻盛董事长所说的“认为实业家是肮脏的人,不和实业家交往”显然是两回事。但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人品也是事实。

实际上在学者的世界中被认为是“肮脏的人”的范畴里,不仅有经济界的人,还包括政治家。政治家、实业家都是肮脏的人,所以不能交往。这样的气氛在日本的学术界相当浓厚。这应该看作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思想中再掺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以一提起“产学协同”(生产与教育的协作),马上就有人说不能同肮脏的人协作。现在马克思的禁忌是没有了,但老庄思想的禁忌还残留着影响。

老庄思想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个人虽然喜欢老庄思想,但在不应该接近权力这一点上,我认为要提出不现实的规范就是缺点。中国、韩国就不一样。韩国本质上是儒教国家,所以学者一定要进入政界,内阁中一定会有两三名学者,而且他们一旦辞去内阁职务,大学就会把他们请进来。美国也是如此。而日本学者一旦插足政界,就被当作肮脏的人,再也回不了大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在日本不能不令人感到实践的智慧和学问好像是两回事。

我就因为拜托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帮助建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而遭到很多谩骂。说什么和政治家打交道就是坏蛋。那么,学者究竟有多干净呢!?他们的内心里

一般都在这么想着：“有什么好处没有？”“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点便宜！”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他们大多热衷于小小的研究室中的人事等的斗争。规模虽然不大，但和政治家一样，整天都在搞派系斗争。

我长年过着学者的生活。我感到学者中除了一小部分人外，能称得上比实业家、政治家更高尚的人并不多。

不过，过去和实业家、政治家交往的学者中，确有不少坏人。我想这也有影响。仅为了贪图私利而和政治家交往的学者也是有的。每看到这样的人，我就觉得不要和政治家交往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要把社会搞好，光靠学者是不行的。还是要借助于政治家、实业家的力量才能办到。如果是真正想把社会搞好，不是谋取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日本乃至人类，我认为应当借助政治家、实业家的力量。

拿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认为拜托了政治家是错的。如果不拜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就办不起来。我认为成立了这样一个为全世界的学者研究日本提供方便、让世界了解日本文化的国际性机构是件好事。而且现实中外国的学者来了都很高兴，外国的研究者中有的人临回去说：“再没有这样好的乐园了！”听到这些反映，我感到是办对了。当年我要是受不可和政治家交往之类禁忌的束缚，这个研究中心就办不起来。

稻盛董事长之所以提出这些严格的要求，我想还是由于确有一些心地纯真的人真正具有了哲学思想，而且在实际中正在做着应该做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说漂亮话的人很多，但是要问在实际中把说的话付诸行动的人

究竟有多少,我看不太多。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从根本上来重新考虑所谓劳动的问题。马克思把生产、劳动放在其对人的看法中的中心位置。这是正确的。即使说马克思主义是错了,但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理论中最正确的部分。但对这种劳动的理解有失误,我认为他忽视了劳动的观念中所包含的自利利他的动机。我们劳动而得到工资,那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我们是为了用它来生活。为了吃上好吃的东西、穿上好衣服、住上好房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劳动也是为了自利。

但不是仅仅如此。还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劳动中也包含着最低限度的利他的动机。劳动挣了钱,首先要养活家里的人。这是人的最初的爱。这可以和母鸟辛苦地找来饵料喂养小鸟的行为相比。生物在本能上就过着利他的生活。然后劳动要使公司能赚钱,能使公司里的人都能维持生活。这不仅仅是能吃上饭就行了,还要让大家过上人的生活。这是很不简单的。

对家里人的利他是最常见的。而让公司里的人都能过上人的生活,就是另一种较高层次的利他了。但只是这样还不行,还要有为了把国家搞好、为人类谋利这些更大的动机。实现了这样第三、第四层次的利他,劳动的行为才会充分发挥效用。必须从根本上考虑这一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已经能为家里人,为公司挣钱,获得的利润就包含着利他。这是第一、第二种利他。到达第三种利他,意识中就必然要包含伦理的规范。看到稻盛董事长所做的事业,并不是我说恭维话,我认为仅就制造这样优秀的商品来说,

也是在为社会作贡献。今后如能继续把利益归还于社会，那就是第三、第四种利他行为。恐怕只有通过这种行动，才会满怀信心地在现在的时代生活下去。

不能只是自己在这个世上活下去，赚钱中要掺入伦理的动机，并且不断地增大这种伦理的动机，利他的动机——我想“新资本主义”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产业人士可以当作圣经的话——稻盛

追求利润中必须有利他，追求利润同时也是利他的手段。因而追求利润要讲究方法，不可以干什么都赚钱。我觉得梅原先生这些话非常好，可以作为我们产业人士的圣经。

不过，要说现在的企业人士，产业人士是不是把梅原先生所说的那种“利他”当作规范在生活，我是感到很大疑问的。但是，如果能遵守刚才所说的正直地做生意、不干不正当的事这两条，我认为日本的资本主义还是有前途的。即使以前没有做到，现在能沉痛地反省，那也是有前途的。

刚才梅原先生的话使我想到二宫尊德^①。我学习不够，说到二宫尊德，只知道小学时教给我的那个背上背着一捆柴，边走边看书的形象。不过，内村鉴三^②在明治时

① 二宫尊德(1787 - 1856)，通称二宫金次郎，江户末期笃农家，以苦学、节俭等美德而著称。

② 内村鉴三(1861 - 1930)，宗教家、评论家。

代所写的《代表性的日本人》这本书中，向欧美介绍日本人时写了西乡隆盛^①、上杉鹰山^②等人，同时也写了尊德。那本书里所写的尊德就认为“获得利益也要讲究方法”。

在江户时代的末期，二宫尊德靠一把锹、一把锄重建了由于忘记了劳动而荒废了的村子。这种村子的荒废，尊德认为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荒废，而是村子里人心的荒废和经济上的荒废交杂在一起。因而在重建工作中特别重视称作“道德”的伦理性，全力贯注于正直的劳动。对于江户幕府的那些卑劣的地方官吏，他也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

看了二宫尊德，感到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伦理观。那是江户时代日本的儒教的道德观。他把这当作一切行动的起点，一步也不偏离，斥责激励村民，靠一把锹重建了村子。当时要重建许多村子，尊德没有使用任何妙计和工业力量，仅靠人力把荒废到濒临死亡的村子变成经济富裕的村子。而且这不是一个地区，各个地方都请他去，他在各地拼命地进行了重建的工作。尊德的人生表明了一种不是通过嘴巴，而是通过实践、依靠道德的道而获得利益的方法。也就是说，繁荣是从勤勉、正直、诚挚之中产生的。

① 西乡隆盛(1821 - 1877)，明治初期政治家。

② 上杉鹰山(1751 - 1822)，江户末期米泽藩藩主。

严重的问题是独立自尊的人 越来越少——梅原

日本人确实忘记了传统的商业伦理。在近代人当中，大概只有福泽谕吉宣扬了商人、即实业家的伦理。可是，就是关于福泽的这种伦理，现代人也没有充分地理解。

福泽谕吉强调独立自尊。他认为没有用自己的腿，自己的思想站起来的独立自尊的人，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是不可能成立的。确实是这样。可是，日本实现了近代化，但令人感到独立自尊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近代化需要有独立自尊的人，可是在推进了近代化的日本，独立自尊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这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吗！？

所谓独立自尊的人，就是具有“哲学”的人。说要有哲学，也并不是认为需要特别艰深的哲学。这里所要求的“哲学”，是说能确立自己的生活态度、能从原理上给予说明的哲学。总的来说，就是自己具不具有严肃生活态度的原则。

明治以后，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具有这种哲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日本的近代化总算是成功了，但独立自尊的人没有了。森鸥外^①说要用两条腿站起来。一条腿是东方，另一条腿是西方。他说具有东方和西方这两条腿教养的独立自尊的人是今后日本人的理想。可是用这样的两条腿、用自己的腿站起来的人，当前的时代比明治时代

^① 森鸥外(1862--1922)，近代作家，作品有《舞女》、《雁》等。

少了。我对这种状况深深地感到忧虑。

“胳膊拧不过大腿”成不了 民主社会——稻盛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确实是丧失了独立自主在生活。说得不好一点，现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处世术占主流。换句话说，现在是在所谓的“以和为贵”的理念下，认为顺从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所以要说什么独立自主，就会变成“异端”。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只限于能够允许的程度，以后必须马上妥协。如果不说“按元老的意见办”，人家就会说：“这小子岂有此理！”我想学会、产业界大概都是如此。

但是，民主的社会应当坚持自己的主张。当然，如果是众寡悬殊，那就要服从多数。但自己的意见不应放弃。按道理应当这么说：“如果大家都说好，我也不反对，服从大家的意见。我的意见虽属少数，但不改变。”可是，在日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意见。如果说“我的意见不改变”，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独立自主对于形成近代社会是必要的，可是被日本社会当作异端可受不了。

福泽谕吉所说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正如梅原先生所说的那样，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我也有同感。在思考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的前途，在考虑近代文明是否牢固时，我认为决不能忽视独立自主的问题。

福泽谕吉说过这样的话：“无独立之气概者，思国之情不深。”今天的日本就是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没有独

立的气概,所以都不想到国、想到公。这里有着产生不择手段赚钱的行为的土壤。

“以和为贵”的真正意义——梅原

我一向是独立自尊地行事,所以被看作是异端分子,吃了很多苦头。看来稻盛董事长也是个异端分子。因为您说为了对付日元升值,日本企业要提高价格,引起了物议,经济界的意见一分为二。

就日本人整体来说,由于缺乏独立自尊的精神,总是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看别人的脸色,附和大多数,归根结底是完全为了自己。这么做要说保险也确实是保险。不过,圣德太子^①所说的“和”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圣德太子说“以和为贵”,是说有了“和”才可以互相讨论。可以讨论,理则通,因而事必成。这才是“以和为贵”的意思。公司如果能有真正的“和”,经理和职员才能充分地讨论。这就是“和”。

日本人误解了它的意思。今天日本所说的“和”不是圣德太子的“和”,而是意味着讨论发生意见对立时,折中处理,和稀泥了事。这样也许会平安无事,但我认为组织不可能发展。当年本田宗一郎恐怕是和职员们进行了讨论、甚至争吵,才建立了本田技研工业公司。^②这才

① 圣德太子(574—623),本名厩户太子,用明天皇的儿子,推古天皇的摄政,制定《十七条宪法》,奠定日本律令制的基础。

② 日本制造摩托车、小型汽车的大公司。1948年由本田宗一郎创立。

是“和”。本田公司是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经营的，最后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企业。我认为公司不这样就不可能发展。

在公司内可以充分讨论，对外也就可以大胆地发表意见，能够不断地进行讨论，比如说，对美国的态度也就可以讨论“这是错的”、“那是对的”了。可是，日本由于平常不讨论，所以对外也就无法发言。不能发言就会吃亏。不能说明自己的文化、思想的原理，这也是很糟糕的。今后如果不能出现大批独立自主的人，我认为就无法同欧美打交道，不可能进行竞争。

在这一点上我是欧洲主义者。不能充分说明自己行为的人，在国际社会中是行不通的。所谓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能力，并不是会不会英语，而是说能不能说明“自己的原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此。能做到这一点，在国际上就能行得通。

不能讨论，不能说明自己的原理，我认为是日本的缺陷。这恐怕也是日本的教育缺陷。我想在本书的最后讨论一下教育。这里我想再一次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做法。

我觉得明治以后曾有过具有某种哲学、具有高尚志向的产业家、政治家。但战后这样的人迅速地减少了。在明治时代，我觉得还残留着长时间成为日本人的精神食粮的儒教、佛教。例如宣扬近代伦理的福泽谕吉和宣扬基督教的内村鉴三的身上就有着相当强烈的儒教的影响。福泽谕吉的独立自主，也可以说是一种否定上下关系的近代的儒教的人格伦理。在近代日本代表性的基督教徒内村鉴三的人生中，也可以看到严格的儒教伦理的强烈

影响。另外，日本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①就受过佛教的无我思想的影响。就哲学家来说，如果把西田几多郎^②和和过哲郎^③作为近代日本代表性的哲学家，西田就受过佛教的影响，和过受过儒教的影响。

也就是说，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还受到过从前一时代继承下来的儒教、佛教的伦理的强烈影响，但到了战后，这种影响就逐渐地消失了。近代日本人在道德上还保存了儒教、佛教的遗产，现在已经把这种遗产吃光了。

现在想改变一下话题。

详细情况不太了解，但听说贵公司——京都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还获得了较高的利润。我觉得这是惊人的。当然，我不会认为稻盛董事长干了什么不正当的事。刚才的谈话中您已经说过，董事长是具有某种理念的，即使和别人采取同一步调，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信念。我想这恐怕还是由于对日本经济的展望跟一般的经营者完全不一样，因而摆脱了固定的概念，预计到某种商品今后绝对需要，结果果然如预计的那样实现了。不知道您本人是如何想的？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想向您请教一下预见未来的经营秘诀。当然，即使听了稻盛董事长的秘诀，我想谁也不可能简单地学到手的。

① 河上肇(1879 - 194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资本论入门》等。

② 西田几多郎(1870 - 1945)，哲学家，建立“西田哲学”学派，著有《善的研究》等。

③ 和过哲郎(1889 - 1960)，哲学家，伦理学家，著有《伦理学》等。

拘泥于“自己的利益”就不可能 看到前景——稻盛

我可不是自吹自擂。前些日子参加日本一个有名的政治评论家的会。他一见我就说：“稻盛先生，不久前在一个经营者团体谈话时，谈到您啦。”我和他只是偶尔见个面搭两句话。他既然这么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呀？”他回答说：“大家都说您戴着远视镜。”我问远视镜是什么东西。他说是能看得远的眼镜，像望远镜一样。接着他说了这样的话：

“据说您有远见，能看到100个人都看不到的远方，所以您一发起什么事情，100个人一齐跟在您的后面都很难跟得上。而且是100个人都看不到的远方，究竟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结果大家说只好跟在您的后面跑。您说说怎样才能看到100个人也看不到的远方？”

我笑了笑说：“哪会看到那么远。”便对付过去了。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放在心上，自己想了想，有一点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拘泥于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利益，看到的范围就会有限。自己周围的狭窄的领域虽然能够看到，但超过一定的范围就看不到了。如果能摆脱利己，摆脱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具体活动，视野就会扩大好多倍。我发觉去掉自己的私心来思考问题，我的视野就会扩大。

老是想着“我”，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窄小的世界里。相反，如果脱离了“自我”，世界观、宇宙观都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我感到摆脱自我，实际上能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

西;拘泥于自我,结果就会看不到世界的真实面貌。

在考虑事业的计划和发展时也同样是如此。例如关于成立第二电讯电话公司的问题^①,大家都说“它的成功只有5%的把握”。在旁人看来,以为是在进行一次“很危险的”事业,所以说我“干得很不错,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太好了。”其实从我来看,我一向认为有90%的成功把握。

空海传来的大日如来的视点——梅原

空海^②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受小我的束缚,所以看不到事物。因而自己要和大日如来^③化为一体。即宇宙的生命和自己化为一体。这时大日如来就进入自己之中。这就是大我。站在大我的立场上,事物就会看得很清楚,而且一般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也能办得到。”

这是密教的教义。就是说,不要受小我的束缚,要站在大我的立场上——用大日如来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就会看得很清楚,事情就会办得很顺利。

所谓“加持祈祷”^④,本来是说大日如来的力量加入

① 指1985年日本实行电讯电话事业民营化,打破国营、半国营的电讯电话企业的垄断,稍盛的京都陶瓷公司等民间公司带头成立了第二电讯电话公司。

② 空海(774—835),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书法家,著有《三教指归》、《文镜秘府论》等。

③ 密教的主佛,认为他和宇宙化为一体,其光明普遍宇宙,故称“大日”。

④ 密教等一种祈求佛陀为人们祛病消灾的秘法。

到人的力量中去。人努力保持住这种力量。也就是说，用宇宙的眼睛来看事物，事物就会看得很清楚，事情就会很顺利。所以空海所说的“加持”并不是骗术。

稻盛董事长所说的意思，我理解是，因为有一颗不受束缚的心，所以能看得远。也就是说，站在空海所说的大日如来的高度，就会看得透彻，产生出智慧。

不过，看得太远，就会和社会不合拍。现在流行的评论家，一般能看到3步远。看这么远是恰到好处。如果看到10步、20步远，就会和社会的步伐不协调。所以最成功的人是能看3步远的人。但是，如果只看3步远，就必须不断地改变视点。能看到100步远就不必改换视点了。

人们也常常说我：“梅原尽干冒险的事！”“经常干那种冒险的赌博。”其实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冒险的赌博。用长远的眼光来看事物，就会得出非这么做不可的结论。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是90%的准确率，而从其他人来看则只有10%的准确率。所以实际做了而获得成功，人家又说我“运气好！”

稻盛董事长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您早已胸有成竹，在您看来有90%准确率的事，在别人看来却认为是“在干极其冒险的事”。其实能够冒险是因为没有私欲，不受束缚。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纯真”是成就事业不可缺少的 动机——稻盛

没有私欲、不受束缚就是纯真。纯真作为完成一件事

业的动机，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某个宗教家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行为中的纯真。”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人有一种仅仅重视结果的倾向。其实这是不对的。在进行这种行为时的纯真要重要得多，而且这种纯真会带来好的结果。”

可是，精通世故的人都怀疑这样是否能行得通。他们想的是“那个坏蛋赚了钱，那个老实人吃了亏”，认为纯真会吃亏。诚然，在短时期内，也许看起来坏人好似成功了，老实人好似吃了亏。所以也许有人会说：“话虽这么说，已经好几年了，干得很巧妙的家伙不是还很得意吗！”但是，用20年、30年的幅度来看人的一生，坏家伙还是不会得意的，诚实的人最后还是过着幸福的生活。您、我不都是这样吗！？

所以我认为应当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不论怎么聪明巧妙，也不能超过20年。我想不论是学者还是实业家都可以这么说。当然，两三年是看不出结果的。短时间来看，坏人可能当道，老实人可能吃亏。但是，用20年的幅度来看，坏人是不能持久的，好人不会总是受苦的。

据说伦敦一些聪明的小城镇医生搞了一个交灵会，一个自称叫希尔巴巴奇的印第安人，灵媒经常附体到其身上说话，还留下了说话的记录。日本已把它翻译成日语，出版了十几本。读了读这些记录，看来希尔巴巴奇还是一个相当高级的灵魂，说了许多很富有哲学意义、宗教意义的话，例如说过这样的话：

“从现在还活着的诸位来看，是坏人当道、好人倒霉。但是，如果把我现在所在的世界也包括在内，情况就不是

这样了。坏人有坏人的下场，好人有好人结局。我可以从你们所生活的世界一直看到我的这个世界。从这样长长的幅度来看一个人的人生，还是丝毫不差，合情合理。”

我以前一直认为，如果是纯真的思想，纯真的行为，就不必计较结果如何。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纯真的思想和行为。不过，如果是搞经营活动，当然不能忽视结果。在这种场合，看50步、100步是不行的，我觉得用20年、30年的幅度来看大概就能对上茬儿了。

用50年的幅度来看事物——梅原

看老实人的结果，实业界需要20年，学术界需要50年。过了50年，一般人都死了，所以要从死后的世界来看人。也就是说，死了之后自己的学术能不能获得承认。学者、艺术家真正的乐趣是死后能不能得到好的评价。

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从短期来看，大多是坏人发财致富，搞阴谋诡计的人吃得开。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所受到的报应还是比较公平的。欺骗人50年是很难做到的。进一步说，要欺骗50年后的人是极难的。人在活着的时候，会有种种的障碍，或者利用权力进行蒙骗。但过了50年来看人时，会下正确的判断的。我想稻盛董事长所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拿第二电讯电话公司来说，在开创这个事业时，很多人是强烈反对的，听说您那时的境遇简直是四面楚歌。但稻盛董事长一个人说没问题。据说唯有稻盛董事长一直深信这个事业会成功。在连周围的人都认为不会

成功的情况下,您有过犹豫和担心吗?

反思“动机是否善、有没有私心”——稻盛

没有。当时就像受到神的指引似的,一点也没有犹豫。越是反对,信心越大。憋足了劲,没有打退堂鼓。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的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和梦中见过的同样的景色。

梦中出现的景色有时会使你感到好像曾经见过多少次。梦中的有些地方使你感到好像自己的故乡那么亲切。可是一睁开眼睛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建立第二电讯电话公司时的心情和这——样,我感到就好像在走一条曾经走过多少次的路一样,所以我一直很有信心,没有什么担心。不管周围的人怎么说担心,而我感到就好像在走一条我走过多次的路。

当然,在设想和修改事业的方案时,还是折腾了好几个月。整天都想着这个问题。晚上睡觉时想,喝完酒回到家里也想。当时认真反思的问题是:“这个方案的动机是否善、有没有私心?”就像禅僧打哑巴禅似地,另一个我向正在思考的我提出了问题:“你说要建立第二电讯电话公司,这是那么干净清白的吗?你的动机中有没有私心?”

就好像在作禅宗的修行时受到质问一样,在作决断的几个月期间,就这样自己给自己提问题。自己这样内心斗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经历了一次修行。所以创立了第二电讯电话公司,实际上我也是感觉好像走了一

条走过几十次的路。

有没有忍受孤独的力量——梅原

我写书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反复地思考。不知道怎么有一天好像突然照射进阳光似的，忽然出现了光明。这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就好像要升天似的，这种心情一般要持续一两个月，进行种种的反思，确信不会有错之后才开始调研，阅读各种文献，到有关的地方去实际调查，感到没有问题之后才动笔写书。书的大部分是在杂志上连载。这时还要反复思考，进行各种调研。于是有时会发现原来设想是圆形的东西竟是椭圆形的。但这并没有脱出最初的设想的框架。我就是这么写成了书。《隐藏的十字架——论法隆寺》、《水底之歌——论柿本人麻吕》都是这么写的。于是出版了书。因为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反复思考过的，所以谁说什么都不害怕。人说“竟然写出这样离经叛道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是极其自然的。

当然，因为是新的学说，所以可能有部分的错误。过去也有人只抓住这一点进行批判，但这只不过是像零件上的螺丝钉没有拧紧一样，所以这种批判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既然是进行崭新的创造，当然会有失误，也可能有部分的错误。人类新的智慧不可能一开始就以完美的形式提出来。但是，要打开新的视野，就应当提出新的前提，大胆地向以前一直被认为干这种事就注定要失败的概念挑战。

民俗学家柳田国男^①和折口信夫^②就是开辟新的知识领域的学者。他们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获得什么承认。有的学者甚至说民俗学是野蛮学。但他们死后获得了承认。现在在研究古代日本的学者中要想找到完全没有受到他们影响的人是极其困难的。

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民俗学的讲座，他们的弟子们继这两位老师之后，正在进行精密的学术研究，但内容枯燥无味。弟子们的研究虽然有体系性和学术性，但柳田和折口用散文写的文章要有意义得多。

他们两人对神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根本不在乎什么学术界的评价，也不介意他们写的文章不是论文而是散文。在他们不拘束于形式而写的文章中有一种发现的喜悦。而现在的民俗学家所写的东西中却根本没有这种发现的喜悦。日本所谓的学术，是模仿的学术，前人开辟了道路自己去走，这当然很保险。但这不是真正的学术。学术总是要向未知的世界挑战。我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挑战。我感到日本基本上没有这种学术。大家都走安全保险的路，所以学术渐渐变得没有意思了。

但是，欧美的学者、企业家并不是这样。欧美的学者有许多人要比日本的学者伟大。我曾经同一位美国的学者争论过。这位学者说：“日本人对我的学说说出这么激烈的话，您是第一个。但您是我的朋友。”“您说出这样

① 柳田国男(1875—1962)，民俗学家。主要著作有《雪国之春》，《远野物语》等。

② 折口信夫(1887—1953)，国文学家。以民俗学的方法研究国文学。著有《古代研究》，《死者书》等。

激烈的话，可能是我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有错误。指出我的错误的人，您是第一个。所以今天能见到您，我感到很幸福。”对于这样的话，当时在场的一位日本学者竟写文章骂我：“对那位大学者说出激烈的话，很没礼貌。”

独立自尊的精神还是让这位西方学者感觉到了。但日本人就是缺乏独立自尊的精神。外国的大学者一来，不是完全同意就是彻底批判，缺乏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的精神。我认为这是很糟糕的。

西方人能有独立自尊的精神，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具有忍受孤独的力量。因为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神，所以能忍受孤独。日本没有这样的神，神就是集体。叫这个集体的神盯着，个人就毫无办法。所以即使自己有了好的设想，也要把忠诚献给集体，放弃自己的设想。

有了宗教就能忍受孤独。从这一点来说，我想稻盛董事长恐怕是信什么神的。而我是叫怨灵给迷住了。

先驱者的条件——稻盛

我经常这么想，传教士大多是一个人或夫妇两人，即使语言不通，也忍受着孤独，在非洲、中南美洲到处传教。在日本的神主^①中就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由于日本人没有培养起独立自尊的精神。

另外，那种自称有学术性，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来搞学问的人，我也认为不可能产生独创性。不抓住一刹那间闪

^① 日本神道教的神社中的主祭、神官。相当于佛教寺庙中的和尚。

现的智慧，没有飞跃，就不可能产生独创性的观点。可是，如果独创性地来思考和写作，人家就会怀疑他的东西是不是有论理的根据，就会贬斥为没有学术价值。要保住这种所谓的“学术性”，就只能产生谁都可能想到的思想。没有某种飞跃的——即有“学术性”的人们所说的“神灵附体的”，超现实的——设想，是不会产生独创性的。

这就等于说先驱者、走在前面的人并不是学术领域里的人。因为那种“神灵附体的”、刹那间闪现的思想要有人采纳它，并付诸实践。但后来的人可以把它理论化。这样就成了学术。

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爱迪生的发明、发现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理论。电气领域是由于闪现了某种念头，在实践中试行而发展起来的。现在的电磁理论全部都是步爱迪生闪现的念头的后尘。对这种闪现的念头，很像神灵附体的学说不予承认，不加以表扬，就很难培养独创性的人。当然，即使是爱迪生，恐怕也是受到很多的指责。当时和现在的情况都是一样。

喜欢理论的学者先生们一般都要集中攻击独创性；缺乏独创性的人们一般都要思路严整地组成一套理论，从而骄横跋扈。对这种现象不能屈服。从这种意义上也应该说，在创造性、独创性上也需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总之，我认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最重要、最必须的。

第二章 共存的哲学与循环的思想

——稻盛和夫、梅原猛

文明危机的警钟——稻盛

在日本，已有人向缺乏经营伦理敲起了警钟，但很多人还不警惕，继续往前走。这样下去，我感到就不是单纯的经营问题，也许会导致现代日本的文明危机。

关于文明的危机，环境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前些日子我看电视，出现了几十万居住在中国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向丝绸之路入口方向迁居的画面。其实我曾经去黄土高原安装过太阳电池。当时人们都在黄土高坡上挖出洞穴，在那里建成窑洞居住。我给他们的这些住居安装上了电灯。画面上清晰地出现的地形和人的模样，都和我去安装太阳电池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这时我把黄土高原的情景和以前听梅原先生谈过的环境问题联系到一起。古代中国的小麦文明在黄河流域产生时，那里还生长着高大的树木，有着极其茂密的森林。后来砍伐了这些森林作为木材，制造了各种用具，产生了文明。但现在那里变成了寸草不生的一片肃杀的景象。看到黄河流域发祥地的荒凉情景，真令人不寒而栗。

梅原先生所说的农耕文明的诞生造成环境破坏的原理，是说生活手段由狩猎变为农耕后，虽然维持了几千年的文明，但农耕不知不觉地毁灭了森林，使土地变成了不毛之地，结果彻底地破坏了环境。这一点我是理解的。您还谈到这种图式一直延续到现在。确实，现在仍在继续不停地破坏环境。例如把原油挖完后，就灌进海水，进一步把残留在地底的原油彻底抽尽。这种做法令人感到非常可怕。

为了纠正这种破坏的图式，出现了一种批评的呼声，认为不能砍伐亚马逊雨林，日本不应购买东南亚的柳安木材。但这里包含着重大的问题。为了防止森林被毁灭，也许应当这样做。但是，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原先恐怕也有着更广阔的原始森林，但现在都开垦出来进行畜牧。在欧洲，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砍伐了森林，变为农场或牧地。就是说，在注意到环境破坏的问题之前，发达国家已经没有森林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不能在巴西这些地方砍伐森林，那么，发达国家就必须用现在所拥有的土地的几成来植树造林。不这么做，恐怕就不能说反对巴西砍伐热带雨林的话。不这么做而高喊“保护森林”，那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要求。如果把这当作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问题是绝对解决不了的。

经营者也需要有文明论——梅原

最近京都大学教授野田宣雄先生著文说政治需要有

文明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例如美国有一个叫汉金顿的人，他提出所谓“文明的冲突”的理论。简单地说，大体上是这样的内容：东亚的文明是以儒教为中心，阿拉伯有阿拉伯的哲学。这些文明和西方文明完全不一样。如果东亚的儒教文明和阿拉伯文明连结起来击退西方文明，是很可怕的。

我认为这种“文明的冲突”论是根本错误的。文明是多种多样的，各不相同。所以一方面要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文明的原理，同时要谦虚地看到自己的文明有什么不足。西方、东亚、阿拉伯都应当思考，互相交谈今后的世界应当怎么办。认为文明是异质的，因而必然会发生冲突，立即导致战争——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是毁灭人类的哲学。

美国有些政治家根据这种文明论在考虑政治。对待这一问题，日本的政治家应当明确地说这种文明论是错误的。我曾向日本的政治家提出这个要求，但同时也感到他们是很难接受的。我把现在的政治家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能理解这种文明论的政治家不知道有没有十个人。

刚才稻盛董事长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文明论的问题。就是说实业家也必须具有一种文明论。我也认为实业家、企业也需要有文明论。一般认为环境破坏问题是21世纪人类最重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对于企业活动也是不能忽视的。

环境破坏是始于农业畜牧文明的形成，在这种农业畜牧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文明，进一步推进了环境破坏。实际上古代文明繁荣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埃

及、印度——全都彻底地破坏了环境。而且这种环境破坏到了工业社会越来越厉害，必须阻止这股潮流，在新的哲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文明。我们正沿着这种文明观，进入必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时代。这是21世纪的企业界人士绝对需要考虑的。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本来具有最重视自然的文明，但在环境问题上已落后于美国和欧洲。欧洲比美国更加神经质，那里正兴起一种不购买破坏自然的企业的商品的“不买运动”。这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今后经营者的一个重大课题。

摆脱“恋母情结”^①文明——稻盛

我学习不够，对环境问题也许还不太懂得，但还是感到所谓环境问题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越出常轨。现在环境仍在遭到破坏，同时产业革命以来的近代文明又在污染环境。我觉得不明了的原因是在于把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谈论环境问题。

也就是说，环境破坏是积极主动地丢失自然环境，而环境污染令人感到是消极被动地、不知不觉地把环境污染。根据梅原先生的说法，破坏是从数千年前由采集转变为农耕、由狩猎转变为畜牧的时候开始的。为了燃料，为了建造房屋，为了造船，于是砍伐山林，而且消费掉的树木多于再生的树木，因而森林的面积缩小了。不用说，现

① 心理学名词，指男孩亲昵反父的心理倾向。

在仍在继续破坏森林。产业革命以后的近代文明又使污染的现象膨胀起来,污染了河流,污染了空气,这些污染发展下去,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所以破坏环境的结构变成双重了。

破坏又加上污染,可以说越发加快了人类丧失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产业人和学者意识到这是严重的问题,认为应当在大难发生之前尽快敲起警钟,采取对策。

但是,由于地球、宇宙的容量太大,危害在短时期内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表露出来。人类把这当作好事,仍然在一意孤行。令人感到这就好像是一个向地球母亲撒娇的孩子,在母亲的膝上任意胡作非为。

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到了应当主动来照顾地球母亲的时候了。可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压在母亲膝头上的身体越来越沉重,几乎要把母亲的膝头压断了,而他还继续坐在那里。这就像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成人还在和母亲撒娇耍赖。所以现代文明可以说是变成了“恋母情结”的文明。

“自然是人的奴隶”的误解——梅原

稻盛董事长说得对,近代对自然的观念是:自然是人的奴隶。因而和认为人越是了解自然越能驱使自然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科学技术。在笛卡儿①、培根②的思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著有《哲学原理》、《情念论》等。

②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

想中可以看到这种观点。而在战后日本流行的美国哲学家杜威^①的思想中更加清楚地表现出这种观点。这种哲学认为：人类以前是自然的奴隶。但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可以把自然当作奴隶了。人类首次战胜了自然。这就是文明。

但是，认为“自然是人的奴隶”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自然是生产了人的母亲。由于母亲的很好照料，孩子才长成可以独立的人。现在孩子却对母亲大发脾气，最后竟然把母亲当作一切都要听从自己的奴隶。错误地把母亲当作奴隶是极大的误解。母亲被人当作奴隶，正如稻盛董事长所说的那样，已经被环境破坏、环境污染弄得疲弊不堪了。必须设法把她拯救出来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日本是父亲经常不待在家里的社会，所以自然的形象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因而我认为干任何事情都要得到母亲的许可。这一点和欧洲不一样。在欧洲，父亲是俨然存在的。

说起近亲通奸，在欧洲据说父亲和女儿的事例最多。而日本最多的是母亲和儿子。儿子有各种性的苦恼，母亲要满足儿子的这种欲望。这种事例占绝大多数。由于是这种心理状态，所以日本人是把自然当作母亲，任意地撒娇耍赖，以为对母亲干任何过分的事，母亲都会宽恕他。但是母亲现在已经疲弊不堪，再也不能允许他撒娇耍赖了。

对于这种环境问题，我一向认为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共存”。前些时候在政府的环境问题恳谈会上，稻盛董

① 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

事长说过这样的话：“光是共存还不行，重要的是——边竞争——边共存。人类没有任何竞争而同其他万物众生共存，就会否定社会的发展。”因而要求“不仅有共存，还要加进竞争的概念”。给政府的最终报告中已经加进了您所说的竞争概念。我对您的发言再一次表示赞赏。希望稻盛董事长谈一谈这个问题。

共存与竞争——稻盛

我感到共存与竞争往往被人们理解为好似对立的概念。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也许是这样。其实从广泛的意义上考虑，共存这个词中就包含着竞争。为了共存下去，激烈的生存竞争必须作为共存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好好主义是不可能形成共存的。

比如有个词叫“食物链”。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生物吃另一种生物，又一种生物吃这种生物，正由于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才形成生物生存的环境。

例如在非洲的热带大草原上，就在进行着“弱肉强食”，因而才存在着野生动植物的环境空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这是共存的重要因素。如果热带大草原上没有肉食动物，仅有草食动物，草食动物就会过度繁殖，吃光植物，最后一切种属都会灭绝。对草食动物进行“间苗”而取得平衡，就是与肉食动物的生存竞争。

从狮、豹捕食捕获物来看，往往是草食动物结队逃跑时出现的掉队者成为它们的饵食。让狮子抓住的一般都

是弱者。它们或者因为年老而跟不上年轻动物的集体行动,或者由于负伤而跑不动,因而成为牺牲品。当然,不是说这些动物都成了牺牲品,但大多成了“间苗”的对象,变成肉食动物的饵料。为了共存而活下去,这种竞争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竞争就不可能共存。

换个比喻来说,佛教中有所谓“小善”、“大善”之说。所谓“小善”就好像父母溺爱孩子。所谓“大善”是指“让喜爱的孩子去闯天下”、“狮子把小狮子推下万丈深谷”之类严酷的行为。即不是小爱,而是大爱。我认为“小善”不能形成共存,“大善”才能成为共存的基础。

佛语说:“小善似大恶,大善似无慈悲”。比如让年幼的孩子去当学徒,这看起来是“无慈悲”,对孩子来说确实是痛苦和伤心。即使是如此,让孩子去当学徒还是“大善”。表面看起来令人感到好似冷酷无情,其实是把喜爱的孩子放到严酷的环境中去经受劳苦,以求得孩子的成长。小善是不让喜爱的孩子去当学徒,经受劳苦,令人感到父母好像是慈爱的。其实这种慈爱会阻碍孩子的成长,所以是“大恶”。

大家都谋求“马马虎虎的共存”,决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共存。不是包含着严酷的生存竞争的共存,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共存。

“进化论”和“分栖理论”^①——梅原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种认为生物是通过生存竞争而不断进化的理论。针对这种理论,今西锦司认为生物并不

是始终斗争，斗争只限定于特别的场合。例如蛟蛉就有很多种类，但它们是分开栖息的。今西是试图用这种“分栖理论”来说明生物界。有人说“分栖理论”的背后有西田几多郎的“场所理论”。所谓“场所理论”是：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实体，而重视场所，人与自然在那里发生关系的场所（西田称之为“无的场所”），就不从实体来考虑，而从场所和关系来考虑这一点来说，有人认为是受佛教的影响，我认为“分栖理论”是按东方哲学的方式来修正达尔文进化论的生物学理论。

稻盛董事长说不能片面地否定生存竞争，没有这种生存竞争，生物的共存就不能成立。按我个人的解释，您的意思是说，生物界强者吃弱者实际上是强者与弱者共存的前提。我觉得这是一种把达尔文理论和今西理论综合起来的理论。

以前我一直认为今西理论很不错。但是回顾一下自己就是在竞争中生活。所以我觉得应当建立一种把达尔文理论和今西理论都加以扬弃的理论。如果只说共存，会变成伪善。我想稻盛董事长的“共存与竞争”的概念大概是在严酷的实践生活中产生的。

就在我不断想看共存的时候，在京都若王子我家的门前出现了野猪，把竹笋吃得一根不剩。最初我以为是人偷的，但还有吃剩的竹笋，这才知道是野猪。第二年围上了栅栏，不让野猪进来。我否定了共存，但这年邻居半夜

① 日本生物学家今西锦司(1902—)提出的理论，认为二种以上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生物，巧妙地把活动时间和栖息场所互相分开而共存，称之为“分栖”。

回家,说看到一只大野猪躺在我家的门前。野猪大概是来说我的共存理论是骗人的。

让人实际感受到地球的平衡的 “玻璃球中的世界”——稻盛

“作为生物的地球”也称作“大地女神(Gaia)”。最令人担心的是它的生态系正在失去平衡。这里可以举出臭氧层、二氧化碳等等各种问题。但最集中的表现,还是人口增加过多。我感到这是重大的危机。据说现在人口已快近100亿。我怀疑宇宙飞船“地球号”是否真能收容全部人类。

我的女儿以前曾经买来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那是一个完全密封的玻璃球形的器具。里面按1/3和2/3的比例装进空气和海水,并用沙子堆积像是陆地。另外还放进几只绦和螺以及几十种细菌,还种植上藻。在海水中种植的藻通过碳酸同化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绦和螺吸进这些氧气,吃细菌和藻为生。而细菌又把绦和螺的排泄物分解,造成藻的营养成分。形成了这样一个完全封闭型的循环体系。这是一个模拟地球的生态系空间。

据说这原来是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制造的,日本的厂商模仿它制成了商品。售价3万日元。我女儿发现了,说是“好东西”,把它买回来了。一看,果然有意思。放在朝阳的地方,海水就蒸发,碰到上面的冷玻璃,变成水滴,像下雨似地滴溜溜地落下来。另外,白天蒸发的水

蒸气，由于夜间的冷气而变成露水降下来。简单明了地使人懂得了自然界发生的水的循环。

如果是普通的完全封闭，里面的生物就会死掉，而这里的绿和螺却活了很长的时间，真令人吃惊。而且让人实际感受到这就是地球。动物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植物吸进二氧化碳，吐出氧气。非常巧妙地形成这种平衡。这种巧妙的平衡稍微失调，生态系就会崩溃，动植物就会死亡。食物链的情况也是这样。但生态系的任何一个链一断，与它有关的生物就会全部死亡。

另外，温度和阳光的照射略有变化，里面的生物也会轻易地死掉。看了这个玻璃器，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生态系是在这种巧妙的平衡基础上形成的。我得到强烈的印象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环境，就建立在这种非常脆弱而巧妙的平衡之上。

现在是建立“新秩序”的前夕——梅原

现在世界虽然出现了种种末期症状，但我认为这是建立新秩序的前夕。过去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特别是今天日本一般认为只要自己的欲望能得到满足就好的思想，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行无阻了，谋求与万物众生共存的转变期已经到来。我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种边界线上。

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就已经够难的了，人与动物或人与植物之间的共存当然有时会更困难。但是，只是说难，是不可能开辟未来的。可以说，现在要求有忍受临产前的

痛苦、建造新秩序的气概。

另外，关于循环问题，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那样，生态系的循环也是很重要的。现代文明正在重新确认这种生态系的循环。例如在工厂中制造产品，以前重视的仅是制造产品，对于如何处理其排泄的污物，基本上没采取什么措施。

人的身体把吃进的东西尽可能地分为便于处理的大、小便，尽可能简洁地处理。人体就是这么形成的。但工厂做不到这样：排泄出大量的大、小便，而且是随便地排出。水俣公害^①等就是这么发生的。必须把工厂本身改变成和人的身体一样，必须尽可能简便地把排泄物还原为自然。工厂也必须遵从自然的循环机能。这是一种循环吧。

我正在考虑另一种循环。过去日本人一直信奉的理想是所谓的“进步”。人逐渐地支配自然。通过对自然的支配，增多人的财富，而且可以无限地增多——认为这就是“进步”。可是，这种无限地支配自然，增多财富的思想，现在眼看着就要走向地狱。必须要保持、永远保持同自然的共存，这就是循环。

要接触还残存在日本各地的原来的自然。这是一种喜悦。孩子们接触到这种原来的自然会深深地感动。孩子看到虫会高兴，看到贝眼睛里会闪现光亮。这是人同自然的直接接触。要永远反复这种令人感动的人

^① 1953—1960年，熊本县水俣湾周围地区，由于附近化学工厂排出的废液造成许多人有机水银中毒，重者死亡，轻者残废，为日本代表性的公害。

同自然的接触。我把这种理想的状态称作循环，所谓“进步”的理想应当转变成这样的理想。所以我想把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坏的事件都解释为新时代来临前夕的混乱。

良知、良心一定会觉醒过来， 回避危机——稻盛

环视现在的日本和世界，正在发生一种好似世纪末的现象，而且在环境问题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也都在发生严重破坏环境的现象。但是，决不要悲观，人的良知、良心一定会觉醒过来，回避危机。不过，为此必须要继承和继续觉醒了的人们所应该做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我认为造成环境问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积极的破坏，砍伐热带林就是其事例。另一个是消极的破坏，即与破坏环境相关联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和水的污染就是如此。我认为必须把这种污染和破坏区别开来。破坏是翻挖土地来挖掘石油，挖掘煤炭，或者为了造纸而砍伐森林，直接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是在缓慢地污染空气、污染水。不要把两者混在一起，笼统地认为是“环境破坏”；而要分离开来，从两个方面严加谴责，这样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

对环境问题作出国际贡献,比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更为重要——梅原

在前首相细川护熙执政时,在首相的下面成立了考虑环境问题的组织——环境问题恳谈会。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这个环境问题恳谈会于今年(1995年)1月提出了最后的方案,大体上决定了三件事:一是在环境问题上进行国际协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不切实地对待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二是设立研究环境问题、积累世界上有用的资料、培养可以处理环境破坏的实践智慧的机构——如环境战略中心这样的机构。最后是促进环境教育。

把这个方案向村山首相提出时,碰上了阪神大地震,认为“现在震灾对策比环境问题更重要”,暂时被搁置在一边。震灾对策当然重要,但环境问题是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恳谈会提出的这三个提案今后要是被日本政府忘记了而不予实行,那可是糟糕的事。

特别是第二项设立对待环境问题的实践智慧的研究中心,是政府的环境厅早就说过的,希望能作为政府的责任,一定付诸实行。

我们的成员到世界各国去考察,强烈感到日本在对待环境问题上落后了。特别是欧美,它们都拥有关于欧美的切实可靠的资料。而我们对亚洲的环境破坏究竟是什么状况却不甚了解。由于日本在这方面行动迟缓,亚洲的

环境破坏正在加速发展，日本应当切实地拥有亚洲的资料，忠告和帮助亚洲国家尽量减少环境破坏来求得现代化。我认为这是亚洲最现代化国家的义务。

前些日子和稻盛董事长一起去访问中国。当时听中国人说，环境破坏正在发展，情况日益严重。他们说长江里快没鱼了，再这么下去鱼都不能吃了，还特别提到北方地区沙漠化正在发展。这是当前的大问题。而再过10年、20年，问题将会更为严重。日本如果能认真对待环境破坏，带去既阻止环境破坏又进行开发的智慧，中国方面也会很高兴的。

在第三章中将谈论协助中国对良渚遗迹的发掘。我认为在环境问题上的协助，恐怕比文化、经济方面的协助更为重要。实际上在和中国的学者交谈时，他们也都热切要求设立对待环境问题的研究机构。

其实在这以前我的心里一直在动摇。在和中国的人民交谈中，我才下了“一定要建立机构”的决心。稻盛董事长现在还斗志昂扬。而我说实在的已年过七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原来的心情是想写写书就行了。这次去中国，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说：“希望您一定要搞！”才下了决心，残留的余生应该干的事情一定要干。

学者干实践性的事情，在日本不太受到好评。学者可以不干现实的事情。日本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类事情要让政治或经营方面的人去干。

但我的想法不一样。人的价值并不是只在知识。人的价值是由行动来决定的。从儒教来说，这是阳明学系统的思想。朱子学是把幕府体制合理化的学问，对社会有利的

学问属阳明学系统。大盐平八郎^①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阳明学者。吉田松阴^②、西乡隆盛也都是阳明学者。学院派的学者至今仍然大多是朱子学者。我认为自己是继承阳明学传统的学者。

有无自愿牺牲的觉悟——稻盛

我也是梅原先生担任委员的恳谈会的成员。我没帮上什么忙,但我认为那个方案归纳整理得很好。正如您所说的,为了人类能在21世纪生存下去,即使眼前有着震撼富裕的日本的困难,该办的事不办是不对的。

另外,关于亚洲各国的环境污染(刚才已经说过,不是破坏,而是污染),日本有许多分析机器。我认为应当把它配备到各国,进行测定,这样可以积累很多资料。测定用的是日本的机器和钱,但收集到的资料数据要全部提供给那里的国家,可能的话还要写上解决的办法。干这么点事花不了多少钱。我认为日本应当去做。这也是助人一臂之力,也是争取近邻友好的一项重要政策。

关于和共存与竞争同等重要的循环的概念。这个循环的概念如果是刚才梅原先生所说的脱离所谓“进步”思想的新思想,就有可能带来的不是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停滞。

① 大盐平八郎(1793—1837),江户后期阳明学者,领导饥民暴动失败后自杀。

② 吉田松阴(1830—1859),江户末期思想家,开办“松下村塾”,培养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领导人,因反幕府被处死。

这样,就要预想到亚洲、中南美洲、非洲等希望今后能获得经济发展的地区,对重视循环的做法表示反对,他们会说:“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这么做也许很好。我们希望发展,应当怎么做呢?”“谈论保护环境、维持循环对发达国家有利。”我们脑子里应当想到怎样来对待这些意见和主张。

为了共生,循环的概念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为了共存,不可否定会随之而带来“牺牲”。自然界的循环,比如食物链中就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原理。肉食动物像间苗似地吃掉草食动物中的掉队者。这就是说,草食动物中付出了牺牲,食物链才会成立。

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个概念原封不动地运用于人的世界呢?从原理上来说是不可忽视的,但不应该认为是完全一样的。我认为不是把人当作牺牲品,而是人应有一种自愿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有一条献出自己而共同生存的路。

后进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希望今后经济上能富裕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把共存、循环之类的概念强加于他们,有可能被认为是已经发展的发达国家的自私。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发达国家必须主动付出牺牲。其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到现在的生活水平会下降。比如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全都开始有限地使用石油资源,那就必须要减少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量,以取得消费的平衡;我们就必须要反问一下自己:“带来如此严厉的自我牺牲的共存的概念,大家能忍受得了吗?”

当然,即使2.6亿人口的美国、1.2亿人口的日本、二亿几千万人口的西欧等发达国家把每人能源消费量减少一半(可以看作是生活水平降低一半),如果12亿人口的中国每人能源消费能增加到现在发达国家的一半,增多的部分还会大于减少的部分。如果把印度的9亿人口也包括进去,我们的水平降低到1/3恐怕还抵偿不上。

那么,该怎么办呢?在现阶段还没有使大家都能幸福的有效的办法。也许是由于宇宙飞船“地球号”将肯定是不可能把大家都容纳进去,所以只好说请大家都要降低一点生活水平。考虑到这样的情况,那就不能不说我们现在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状态。

不过,我也同意梅原先生的说法,人类的睿智是不会那么容易枯竭的,在到达这样的绝境之前,新的睿智也许会解决能源的问题。我认为不必那么悲观。

构筑循环型工业社会——梅原

循环的概念中有各种思想。所以某种思想可能会带来停滞,而某种思想也许不会引起否定现在的工业社会的后果。

例如印度教的思想可以称之为循环型。按这种体系来改变工业社会的状况,那就会产生不只是抑制工业生产的循环的方式。现在的工业社会虽然胃囊的部分非常发达,但减少残存物或使其变成可以还原到自然界的物质的肠的部分的机能太小,所以把工业的排出物搞得很干净,建立使其与再生产相联系的体系——这样的工业

社会同循环的思想并不矛盾,也不会否定工业。

实际上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不是工业社会,但也维持了一个循环型的社会。听河合雅雄君说,日本自太古以来一直到明治维新,生物没有一个种属灭绝过。动物、植物的种属没有灭绝,说明社会形态是循环的体系。比如说,人吃了农作物,变成大小便,成为肥料,为农作物所吸收,又被人吃掉,这个体系就是循环。

这么说,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因为是农业社会,所以这才有可能。”但是,农业社会砍伐森林、灭绝动植物的地方,在历史上有的是。从公元前三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地方的几尔加美休王的时代起就有这样的思想。几尔加美休王在小麦农业和畜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了最早的城市文明。他当了王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害了森林之神芬巴巴^①。这意味着文明肯定了破坏森林。我认为所谓“进步”的思想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农业或畜牧也有非循环型的体系。如果从通过农业、畜牧破坏了自然的人们来看,也许会说:“什么循环,那是在狩猎采集社会才有可能。”我认为工业社会也有可能转变为循环型。

把共存和循环的概念作一比较,我认为是可以这么说的。所谓共存,可以说是自觉到在现在这一时间轴上,我们的生命同万物众生的生命有着横的联系。循环则是生命的纵的联系。

① 关于几尔加美休王的传说故事,梅原猛写过一个剧本,中译本已出版(卞立强译,1990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人类文明启示录——几尔加美休》,1996年2月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

我切身感到的循环是来自我带着孙子到老家去时的体验。当时我像小时候一样，和孙子一块儿捕蝉，然后下海里去捕捉鱼、贝、海葵、海胆玩儿。

现在捕捉的人是从我数起相当于第二代子孙的孙子，被捕捉的蝉是被我所捕的蝉几十代后的子孙，鱼和海葵等也许也都是我所捕的鱼和海葵等的几十代后的子孙。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各自的子孙又在一起相遇了。

这种人与自然的相遇和分别要永远继续下去……我觉得现在的人已经忽视了这种纵的联系。我担心这样的人生观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污染地球，到了孙子的时代就不会有美丽的地球了。我想到没有了蝉，没有了海葵，人将为什么而活着呢？不论发展到什么时代，永远要有到山上有蝉，下海里有海葵的环境。我提倡的循环也包含人与自然的接触要永远继续下去的意思。

这种思想是一种原理。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理想应当是在这一原理的基础之上获得经济上的繁荣。确实如您所说的那样，这里有着不好解决的难题。但我认为这是人的生存的原点和原理，抽掉共存和循环的理念，就不可能有未来的世界。

人的思想确实在变——稻盛

现在我们正在开发的有关软能源的事业中有太阳电池。开始这一工作以来已整整20年了。去年政府实行了一项政策，一般家庭在屋顶上安上3000瓦左右的发电装置时，由政府补助其费用的一半。

3000瓦的太阳电池需要600万日元的费用。付款的方式是政府补助270万日元，剩下的330万日元由个人负担。我们积极宣传“在自己家安装太阳电池，用自然的软能源发电”，立即就有很多人来申请。

不过，政府拨给的预算是20亿日元，只能补助700家。因而采取了抽签的办法。在没有中签的人们当中，有些人竟然说：“没有补助金，600万日元全部由我自己付，给我安装太阳电池吧。”我感到非常高兴。

太阳电池有三十多年的寿命。但从成本上来说，安装起来比商业电力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安装太阳电池。其中有的人这么说：

“我有600万日元的存款。存款是600万，现在的利率是2—3%，每年拿多少利息也是知道的。用这笔钱来安装太阳电池，它给我发电，省下的电费和利息大体相等就行了。可以这么想，与其把存款放在银行里，还不如放在屋瓦上。仅就关怀地球这一点来说，我也心安理得了。”

有的人有这样的思想，使我非常感动。

另外，作为考虑地球环境的商品，还有一种页式打印机。页式打印机一般印了五六千页，磁鼓的部件就会磨损，需要更换。制造厂家一般是通过更换磁鼓的键控穿孔器来获取利润的。

问题是这种使用过的磁鼓变成大量的废料，不可能全部回收。而有些厂商把它从世界各地收集起来，拿到中国去重新制造。这有点像输出公害。

我们认为不应该这么做，决定开发半永久性的磁鼓，只出售装进这半永久性磁鼓的页式打印机。这种机器一

直到它寿命结束(大约可印30万张),不需要更换任何部件;只要放进相当于印刷油墨的供体,要印多少张都可以。但价格怎么也要提高。准备拿进市场时,很多人说:“这绝对卖不出去。”“价格一开始就高三四成,销不掉。”

因此,我想求助于人的良知,大力宣传这是爱护地球的打印机。打印机当然要使用许多纸张,说它爱护地球未免有点奇怪,但这种打印机不需要用过扔掉的备品,不污染地球,因此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出售。

美国不太接受,但在欧洲获得了事务机器奖的大奖,有的企业说贵三四成也愿意使用。日本一些具有先进的生态学思想的企业也说:“我们公司全部换成这种机器。”

所以我认为,人们的思想水平正在提高,只要是有利于地球的产品,即使价格贵一下,也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感到很高兴。

另外还有一种用太阳电池开动的车子(称作太阳能汽车),也与我们的公司有关系。技术人员曾建议我们京都陶瓷公司也制造太阳能汽车,我认为“车子可以不要造了”,但大学等单位正在试制的太阳能汽车的太阳电池和装备等很多都是我们公司提供的。所以纵贯澳大利亚的太阳能汽车大赛和在能登半岛举行的大赛,跑的车子大多是用我们公司的技术制造的。

有些技术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理想,离实用还很远,但我认为不会永远以理想而告终。技术可以提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考虑将来时,不应悲观,而要乐观;在付诸实行时,不应乐观,而要悲观——我认为这

是通向成功的一种智慧。

只要认真对待，一定会产生 新的技术——梅原

欧洲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凡是污染环境的东西，都不会受到好评。所以企业都要自己抑制违反环境保护的行为。这是欧洲的消费者比日本的消费者先进的地方。但日本今后也会逐渐变成这样的。日本的企业考虑到这一点的人也许还不多，但我认为这是时代的潮流。

西欧人具有人要征服自然的自然观，但对于环境问题却有较高的认识。相反，日本人在传统上就具有与自然合为一体的自然观，对环境问题反而认识较差。这是很奇怪的事。

我考虑大概是这样的原因：日本的学术本身一般都是模仿欧洲，即没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日本从欧洲吸取了近代思想，至今仍然极其重视近代思想。但欧洲人对自己创造的近代已感到怀疑，认为应当克服近代的缺点，所以开始创立超越近代思想框框的思想。这就是所谓近代后思想。而日本一说近代后思想，往往认为是右翼的思想（日本式的思想），从而敬而远之。日本思想界的中心还是近代主义者。

不过，太阳能电池如果花600万日元就能装上，我也要买的。其实关于太阳能电池，人们早就有所不满。因为觉得用太阳光发电成本就会提高，令人感到国家和企业并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如果原子能不能发电，石油、煤炭又

不能用，太阳光发电的技术肯定会飞跃地发展。所以我经常想，现在如果能认真地对待，一定可以制造出价格便宜的机器。总之，大企业大概认为维持现状可以赚钱，“何必干这种不赚钱的事”。

不过，我想企业中对环境的认识会有变化的。我父亲原来是丰田汽车公司的技术人员，是设计“光冠”、“皇冠”牌汽车的负责人。我同父亲曾经在汽车杂志上进行过对话。当时父亲说：“今后会出现用太阳能电池发动的汽车。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就是刚才稻盛董事长所说的太阳能汽车。说实在的，我一直把父亲看作是“用现有技术能赚钱就行”的技术人员，对他能想到这些感到吃惊。

父亲的一定要开发用太阳能电池发动的汽车的看法，不知道有没有付诸实行。丰田公司是由制造纺织机械而转入制造汽车的，我认为这就是很大的冒险。据说进行这种冒险的丰田喜一郎，实际上是由于不满他的父亲丰田佐吉的做法而开始的。现在丰田公司获得这样的发展要归功于喜一郎的冒险心。日本的产业恐怕也应当逐渐放眼新时代，进行这样的冒险。

我的话有点离题了。刚才稻盛董事长说计划要乐观，实行要悲观。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我在实行时也总是考虑到最坏的情况。想到最坏的情况，不论出现什么样的后果都不会悲观，不会绝望。

另外，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会发觉“这么写不行”。尽管一直以为“可以按这样的设想来写”，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发现这是“根本错误的”。我曾经有两次这样的经验。当时都中途停笔，向读者道歉。这虽然是很难受的，但

我还是认为不要固执于错误的假说。

我想经营事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现了不行，就应当尽快放弃。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可执著。发现行不通的计划，要有勇气停止。要经常具有重新挑战的心理准备。这对于学者和实业家都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智慧。

第三章 学习过去,思考未来

——稻盛和夫、梅原猛

大米的富饶与小麦的富饶——梅原

位于中国长江下游南侧的浙江省,有一个称作良渚遗迹的古代遗迹。那里三面是山,在一条可能是运河的河流的外侧,建造了一道好似城墙的墙壁。

另外,在遗迹的西北,我听说有一座东西长680米、南北宽450米、高8米的山。原来以为那是自然形成的小山。经过调查,才知道是人工堆造的山。这座山和万里长城、高松冢古坟^①一样,是用夯实泥土的所谓版筑的方法造成的。而且在这座山上又造了另一座山。也就是说,在堆积的泥土之上又堆积了泥土,人工造成了两层的山。另外在这个遗迹的附近,还有一座也是用版筑方法造成的人工山,叫作反山。那里有十一二座良渚时代的古墓正在发掘。

关于良渚遗迹的意义,我是这么考虑的:从世界史的

^① 高松冢是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一座8世纪的古墓,1972年发掘,其中有极其华美的彩色壁画。

范围来看农耕文明的发祥,一般认为首先是12000年前在西亚开始了小麦农业。附带说一下,小麦农业和畜牧是同时开始的。而西亚的这种小麦农业约在5000年前产生了城市文明和宫廷文明。

最初,由苏美尔人建立了一座叫乌鲁克的城镇,其国王的名字叫几尔加美休。记载着几尔加美休王的事迹的粘土版已被发现,正在解读。读了粘土版,我被吸引住了。因为几尔加美休王首先干的一件事,就是杀害了森林之神芬巴巴。^①

对此我是这么解释的:以前森林里有芬巴巴在把守,阻止砍伐树木。也就是说,有着不能砍伐森林树木的禁忌。首次建立了城市文明的王杀害了这位芬巴巴,意思就是获得了破坏森林的自由。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着开垦森林,进行农业和畜牧的故事。

由于砍伐树木,开垦森林,建成耕地和牧地,于是产生西亚的城市文明。如果说在这种小麦农业和畜牧的基础上产生了城市文明,我想水稻农业也必然会产生城市文明。大米是比小麦营养价值更高的谷物。中国把富饶的地区称作“鱼米之乡”。也就是说,大米是“富饶”的代名词。据说小麦农业的地带如果能引水灌溉的话,一般也要改为水稻农业。从来没有由种水稻改种小麦的情况,能种水稻的都种水稻。因为种水稻可以带来富饶。

水稻农业大约是在5000年前始于云南这个地方,3000年前到达长江下游,2000年前传到日本。这种看

^① 参看第64页注①。

法过去已成为定论。但两年前我偶然访问了中国的河姆渡，由此我觉得有必要改变我关于水稻种植历史的常识。

这个河姆渡遗迹据说是7000年前的遗迹。从那里发现了因洪水而堆积的稻穗。那里的水稻有两种——印度水稻和日本水稻。在其附近有一个叫作罗家角的7000年前的遗迹，另外在长江中游还有一个9000年前的遗迹。说不定还会发现其他的古代遗迹。水稻农业也许在1万年前或更古的时代就已经开始。这就是说，水稻农业大体上是和小麦农业同时开始的。

如果说5000年前西亚的小麦农业建立了城市文明，那么水稻农业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一定也会建立城市文明。良渚遗迹是5300年前—4200年前的遗迹，我想它一定是城市文明的遗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城市文明是在大约5000年前东西方同时成立的。

先人之见会使人看不到可能性——稻盛

种植水稻可以说要比种植小麦的生产率高得多。一粒稻子可以分蘖，长出几根茎，结出的稻粒要比小麦多。小麦是一粒麦子一根茎，不能分蘖。所以一粒种子的收获量不一样。这样一来，生产力就不一样。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种植水稻要比种植小麦有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明。

另外，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良渚文化很可能继续下来，与北方的黄河流域出现的青铜器文明相联结，只是截至目前为止的研究还没有搞清楚。很可能是继承了下来，但没有往青铜器之前追溯，而把它一刀切断了。我想这很

可能是认为黄河文明以前没有城市文明的一个原因。认为“黄河文明最早”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先入之见，它使人看不到另一种可能性。这不只是我一直这么想的，良渚文明遗迹的出现，已成为推翻这种先入之见的开端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被抹煞了的历史——梅原

在良渚水稻文明繁荣时，黄河流域连小麦也没有。秦始皇的时代究竟有没有小麦也令人怀疑。那他们吃什么呢？吃稗子、谷子。另外有畜牧，还吃黄油、奶酪。所以从食物的生产率来说，肯定是长江流域高。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么宝贵的遗迹为什么以前被人遗忘了呢？说起中国的古代文明，都说是起始于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其中夏的文明还未弄清楚，商、周的文明可以通过考古学的遗物清楚地说明。建立夏王朝是禹。据司马迁所写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史记》说，禹是黄帝的玄孙。黄帝是首次统一中国的王，据说他是消灭了称作“蚩尤”的蚩族而统一了中国。所谓蚩尤就是虫的意思，给人一种蚕或蛇的印象。我觉得这蚩尤的根据地很可能就是良渚。那里的文明是养蚕的文明，崇拜蛇的文明。也可以说是覆灭了南方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在北方黄河流域建立了文明。而这位黄帝的权力的继承者是夏、商、周，接下来是秦、汉帝国。汉朝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当然要采取这种以北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因而抹煞了良渚文明——我是这么考虑的。

那么,曾经是先进的文化圈良渚是怎么覆灭的呢?可以作这样的推测:良渚在文化上已经烂熟,而且又是农耕民族,恐怕是因和平而麻痹了。而这时骑在马上游牧民族是善于打仗的。很可能是他们怀着一种饥饿精神猛扑过来,一下子就把农耕民族打垮了。

中国的历史一般是北方民族统治南方的历史。极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建造万里长城和开凿大运河。万里长城是为了防止强悍的异民族从北方侵入,大运河是为了把南方丰富的物资运往北方。中国一向是反复地这么做的,一直延续到现在。但现在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停止了这样的吸取,南方正获得飞速发展。现在是南方的时代。

这些姑且不说了。我认为很可能是北方的骑马民族用强大的武力征服了南方,模仿良渚的所谓“玉器文明”,在北方也创立了文明。我们可以举出良渚出土的玉器上的图案作为这种看法的一个根据。这种图案和青铜器上的图案完全一样。另外,良渚出土的黑陶鼎的形状也和青铜器相似,简直是像直接的仿制。我感到青铜器很可能在形状上是模仿黑陶,在图案上是模仿玉器的图案。

不过,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前基本上没有得到阐明。前些日子在北京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有两个了不起的遗迹。一个是秦始皇的墓。但不是我们提到的兵马俑。兵马俑是保护秦始皇的军队的墓,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所以秦始皇本人的墓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更了不起的东西。《史记》里描写了墓的样子,可以想象是很了不起的,但实际情况还一无所知。因为根

本还未发掘。

俞馆长举出的另一个遗迹就是良渚遗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有人说到“良渚遗迹还只了解5%”时，俞馆长说：“哪有5%，连1%也不了解。”可见中国也有像我这样肯定良渚遗迹价值的学者。

不过，可以想象良渚文明很可能是木造建筑，所以不知道究竟能发掘出多少东西。西亚最初基本上也是木造建筑，后来由于砍伐树木，森林没有了，才改为石造，所以发掘出石造的遗迹，可以进行对建筑物等的研究。良渚遗迹恐怕没有这种可能性。谈一点题外的话，西亚改用石柱之后，仍想模仿木柱的样子，所以产生了所谓“凸肚状”(entasis)的柱子样式。日本法隆寺^①的柱子就是用木头模仿这种石柱的样式。本来是木柱模仿石柱，可是又由石柱模仿木柱，再由木柱模仿石柱。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离题太远了。西亚地方由于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建筑改用石头。但良渚直到晚期(现在在遗迹的地区仍有森林)恐怕还是木造建筑。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就不可能指望木材直到今天还没有腐烂而留存下来，所以不能不想到要发现建筑物是很困难的。

除此之外，良渚还会遇上火灾。据我想象，从北方打过来的黄帝的军队肯定会把木造的宫殿等付之一炬。从遗迹中出现大量烧过的焦土就是旁证。现在虽然还不太清楚这些烧过的焦土是什么性质，但事实上是出现了大片烧过的焦土。我想这恐怕还是都城变成了一片焦土。

^① 日本著名的寺院，位于奈良县斑鳩町，609年由圣德太子创建，690年烧毁，现在的法隆寺是7世纪末重建的。

不过，玉器文化还是完整地延续到后世。日本青森县的三内丸山遗迹大体上是4500年前的遗迹。那里也有着翡翠的文化，即有着与良渚同样的玉的文化。我认为玉文化可能是泛东亚的文化。玉器是石器的一种。我觉得把石器变成偶像而加以崇拜之后，就出现了玉器。把石器当作神来崇拜的现象在西方是没有的。

技术的磨练是在实用 中产生的——稻盛

也许是因为经过了连人骨头都烂化了的漫长的时间，所以只剩下了玉器。如果说留下的东西都烂光了，那也就只好从玉器来推测了。仅凭玉器也完全可以想象这是相当高级的文明。

良渚出土的石斧，实际上是玉斧。看到这种斧子，联想到良渚的高贵的人们是既不需要打仗，也不需要劳动。这些人所拿的东西只要带有象征性就行了，所以才有这种不实用的斧子。

把这种玉器放在灯光下一照就可明白，材料是翡翠。翡翠是氧化硅形成的石头，本来是一种透明的物质。其中如果掺进不纯物，则变成花纹的模样。翡翠是氧化硅的多结晶，纯度很高，所以呈半透明状，非常漂亮。但另一方面，结晶体的性质又非常脆弱，强度不大。所以一般用作制造象征性的器物。

拿铁文明来说，大人物拿的刀都施以镶嵌物，变成了装饰品。原因是只佩在腰间，并不实际使用。参加实战的

人所使用的刀，是藏在手杖中的二人夺，或裹上皮革，以免沾上血而滑溜，非常实用。也可以说大人物所拿的任何器具都变成了装饰品。如果是这样，良渚有着玉器的装饰器具，我认为这证明了那里有过高贵的人物。

关于具有非常优秀的研磨技术的问题，我想在后面详细谈。既然是有着这样优秀的技术，我想那就不仅是玉器，对于实战用的坚硬而不易断裂的石头也同样地可以加工，可以实际制造。也就是说，对于木材也可以进行和使用金属器一样的精密加工。

所谓石斧，以前一直认为是把天然的石头劈开，只要有锐角的面就可以当斧子来使用，或者用作箭镞。但从良渚遗迹的技术来看，那里的石器不单纯是劈开的，也有磨制的。而且我感到这种技术最初是用于磨制实用品，而不是磨制大人物的玉器。因为我认为石器是比想象的要更加实用、更加方便的工具，所以长时间受到重视。

石器之后出现了青铜器文明，一般认为那是非常发达的文明。但我认为青铜器不可能全部代替石器。就青铜器来说，确实可以大量制造同一个东西。因为把铜溶化，注入模子，就可以大量生产。而且它比木器或竹器经久耐用。但是，要加工什么东西，如果没有石头那样的硬度是很难加工的。也就是说，青铜器作为实际加工使用的工具则太软，不好使用。所以我认为即使在青铜器文明期间，匠人使用石器的方式还会留存相当长的时间。

和自然调和的文明——梅原

前年(1993年)7月访华,是我首次接触到良渚遗迹。当时计划一次乘坐豪华船“飞鸟”号探寻遣唐使路线的旅行。我应邀参加了这次旅行。

从大阪经福冈到达了宁波。在宁波住了一宿之后,日程分为几条路线。一条是去最澄^①所开创的日本天台宗的故乡天台山,还有在宁波市内参观的路线等。我选择了参观市内的路线,看了道元^②修行过的天童寺和鉴真待过的阿育王寺等,另外还参观了刚才谈到的河姆渡这一早期农业遗迹。

这个农耕遗迹太了不起了。它表明早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就已经发展了水稻农业。仅就这一点也可以说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另外陶器上绘有蚕,表明已经开始生产丝绸。那里还出土了优美的彩色黑陶和初期阶段的玉器。我是农村长大的,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那里还出土了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差不多一样的织布机。

看到这些东西,我非常感动,同时产生了一种推想:北方有着稗子和谷子的农业,它产生了所谓的黄河文明。但稗子、谷子和大米的生产率很不一样。大米的生产率要高好几倍。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进行生产,水稻农业比稗子、谷子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因而可以认为,长江下

① 最澄(767—822),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开山祖师,著有《显戒论》等。

② 道元(1200—1253),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开山祖师,著有《正眼法藏》等。

游既然存在着生产率高的水稻农业，一定盛开过城市文明的花朵。

那一年的12月，我正好有点空暇，于是怀着彻底探访水稻农业遗迹的目的，再次访问了中国。这次去了良渚遗迹，看到了优美的玉器。玉器是东方人的理想。它非常晶莹清澈，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但丝毫没有媚态。看到它，再一次使我感动。

这个良渚遗迹一度发掘过，但中途停止了。我问领我去参观的毛昭晰先生说：“好不容易出土了这么好的东西，停止发掘太可惜了。重新恢复发掘不好吗？”毛先生回答说：“现在中国忙于发展经济，没有这么多钱。”

于是我说：“如果能从日本引入资金，可以恢复发掘吗？”毛先生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了。”我回到日本以后，兴奋的劲头还没有消退，正好有着和稻盛董事长一起上电视的机会，因此请求您说：“有这么一回事，您能出资金吗？”承蒙您答应说：“出吧。”于是我们一起去当地转了一趟。

稻盛董事长访问良渚遗迹时说：“气候以及生长的植物和我出生的鹿儿岛完全一样。”日本人一向是从事水稻农业的。我感到这儿的环境容易使日本人有好感。

农耕、畜牧要砍伐森林，带来自然的破坏。但我感到小麦农业和水稻农业在破坏自然这一点上还有所不同。小麦农业和畜牧不太需要雨水。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发成耕地，不能成为耕地的地方可以作为牧地，饲养牛羊。这样一来，森林很快就变成耕地或牧地，其结果是森林迅速减少。也就是说，一旦开始发展小麦农业和畜牧，

就有着无法停止破坏自然的倾向。但水稻农业一定需要水。人类自古以来就懂得森林能储存水，所以水稻农业文明有着重视森林的倾向。

实际上日本在接受水稻种植之后，至今仍然保留下很多的森林，国土的2/3仍是森林。在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属小麦文明，已经没有森林了。但长江以南地区属水稻文明，仍有森林。这说明水稻文明地区没有几尔加美休。我认为这个良渚文明和几尔加美休的文明不一样，它是一种考虑到要和自然调和的文明。

从古代文明中获得的想象力——稻盛

大家领我去参观了遗迹的重点地方，沿途也观赏了周围的风景。当时正是春天来临、草木吐芽的季节，桃花梨花盛开，到处一片青翠。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路旁的杂草和日本九州一带所生长的杂草极其相似。我感到植物的生态系和九州很相近。

我一边参观良渚遗迹，一边作种种的想象。总的来说，我强烈地感到人类一旦掌握了工具，就会发展杰出的文明。以前我只是听说过或学习过，实际看到古代文明的遗迹，才真正地理解了。

说是工具，在最初阶段不过是一根棍子，说是石器，我想大概是用石块掷打野兽吧！发展到像良渚遗迹出土的石斧那样精美的石器，应该是连船只、建筑物都可以建造了。具有把石器做到那样精巧程度的技术，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文明。

这次看到良渚遗迹出土的物品，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砍削过的硬石头上雕刻纹样，竟有两种雕刻的方式——一种是把纹样深刻进去，另一种是让纹样浮现出来。玉斧整体是光滑的，只有一角浮现出细线的纹样。这使我大吃一惊。仅刻上细线就已经够难的了，而玉斧上是把这样的细线浮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是相当高的技术。

按我们现在的技术来考虑，马上会联想到“凸版印刷”。所谓“石版”的印刷方法最初是开始于西欧，这种方法是把石灰岩之类的石板磨平，用酸类不能腐蚀的物质在上面写字，然后用酸冲洗，没有腐蚀的部分就浮现出文字。现在称作“蚀刻”的技术，也是用药品腐蚀，使其浮现出文字或纹样。

还有一种方法。在想要浮现出来的地方用漆划上线条，趁漆还没有完全凝固、留有弹性的时候喷上沙。这样也可以起到和蚀刻同样的作用。因为是用高压空气喷上沙，所以称作“喷沙”。现在制造凸面，不是用药品蚀刻的方法就是用喷沙的方法。

在根本没有这种技术的时代，竟然做出这样非常精密的浮雕工艺。我想象可能是在精微加工的地方和粗加工的地方分别使用最细的石粉和粗石粉磨研的。遗迹中出土了滤酒的器具。如果使用这种器具，利用倾斜沉降法完全可能把磨研的石粉按粗细分开。轻而细的石粉沉淀在前面，粗石粉沉淀在后面。不过，对这种想法我又感到怀疑起来。因为其凸面、浮出的纹样非常精巧。做凸出的纹样和刻凹下的纹样，在精巧加工的难易程度上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透雕。这是令人非常伤脑筋的工艺。因为其孔穴是直角。在坚硬的东西上开个尖孔是很难的。用现在的机器来挖刻、必然会成锥形——上面大，下面小。所以很难成为直角。用药物腐蚀的方法——比如用酸腐蚀时，也是从上面慢慢往下腐蚀。用机器加工或用药物开孔，都很难形成完美的直角。

在制造最先进的半导体超大型集成电路时，是用微米或半微米的微小幅度蚀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很好地控制，我们想用微型指令计算机来切直角。这如果能够做成，将是20世纪的尖端技术。可是一看良渚遗迹的玉器，它是成直角的。这使我大为吃惊。为什么现在都很难做到的事那个时代就已经做到了呢？

透雕的纹样上还有尖角。还能雕成角是蜷曲的直角，而在自动铅笔的尖子都进不去的地方形成锐角。能雕成这样的工艺，我为这样了不起的技术感到吃惊。拥有这样的加工技术，我认为这是相当高的文明。

当时的东西除了玉器之外，其他的東西都未遗留下来。大概因为是潮湿地带，木材、丝绸之类的有机物几乎全烂掉了，只留下石文化的遗物。但是，不论是神殿、房屋还是穿着的衣物，我想大概都是相当高级的。仅从那里的玉器来看，也可以感到其周围的东西都会是相当高级的。

当日中联合开始实际发掘工作，并出土什么精美的玉器时，我希望能通知我。我排除万难也要飞到那里去。因为我想如果许可的话，把出土的遗物摆在面前，和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有时还可以一边饮酒一边观赏——度过几天。也许人们会说：这是非常贵重的物品，一边饮酒

一边观看未免有点轻率,但我认为可以这么做。

因为通过在观赏出土物品的过程中所涌现的灵感,如能作出种种的想象,聚集在那里的专家的专业愈是不同,愈会产生许多观点看法。我觉得通过这种想象力可能会把古代文明再现出来。

从玉器联想到现代的技术——梅原

稻盛董事长的观察眼光令人吃惊。我是哲学家,喜爱艺术,所以感到的想到的都是艺术上如何精美,是否包含着某种思想之类的问题,并在这些方面发出感叹。而稻盛董事长首先着眼于“怎么做成的?”这些观点看法我是想象不到的。

就拿良渚遗迹的玉器来说,您是从“用陶瓷的技术能不能做出”的角度来看的。您想的是,如果这样来研磨会做出同样的东西。我看到雕刻得非常精巧的东西而为它的精巧惊叹。那种精巧是人的肉眼看不到的,要用放大镜来看才能领会的。我对此感到佩服。稻盛董事长不是这样。您是考虑雕刻的方法。从技术方面来考虑这种雕刻很简单、浮雕又非常难之类的问题。我们不太考虑技术问题。

不过,从与现代技术相比较的角度来考虑古代文明,由此来开发新的陶瓷技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访古知新——稻盛

在生产技术的领域里，我想也应当访古知新。刚才所谈的雕刻方法，我就有实际的感受。

我是在昭和30年代初期(1955年)创立京都陶瓷公司的。当时在陶瓷方面已经有了很出色的公司。所以我应当朝着与过去的陶瓷形态不同的所谓矿物合成的方向去发展。特别想烧制硬陶瓷，用高温来烧固非常纯粹的金属氧化物，烧制不同于一般陶瓷的产品。所以我是声称要烧制一切工业材料而开始我的经营工作的。

由于我是首先在电子业界开发把陶瓷用作绝缘材料的技术，所以大家都跑来找我说：“能做出这么好的新的精制陶瓷，我们公司一定使用。”但是作为工业材料的陶瓷要求有非常高的精密度。而且不是制造一个，而是要求几百个、几千个产品都同样大小、具有同样的精密度。要求像过去真空管中的绝缘材料那样的产品，其难度就和良渚遗迹出土的玉器上的透雕完全一样。

如果不说什么都能制造，人们就不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营业时是说尽管难也“能制造”。于是他们说：“找任何地方都说不行。连一些很优秀的公司也说不能制造。你们这里真能制造吗？”我们嘴巴上说“可以！”可是一看对产品的精密度的要求，叫我们吓一跳。

陶瓷这东西一烧就会缩，这称之为“窑变”，一般都是要变形的。颜色会变，形状也会变。据说这种窑变正是陶瓷的妙趣。也就是说，期待着开窑一看，究竟烧成什么样

的陶瓷,那是最有趣的。我们是要在这样烧制陶瓷的领域里提供几百个、几千个尺码大小不变、精密度极高的产品,所以烧了之后收缩变形就不能成为工业材料。

最初的想法是,除了研磨来修正外形和大小之外,恐怕没有其他的简单加工的方法。烧了之后变形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考虑的是怎样把烧制好的产品简单地加以研磨,使大量的产品大小一样。可是,陶瓷具有极硬的性质。一般的陶瓷都相当硬,我们制造的陶瓷更硬。一般的陶瓷研磨起来都很难,要研磨比一般陶瓷更硬的陶瓷实在没有办法。

因此,接着想到的是怎样使烧出来的陶瓷就有很高的精密度。对此努力进行了研究,终于制造了烧出来就有很高精密度的产品。这可以说是我首次成功。尽管如此,机械的精密度还是有局限性的,当人们要求更高的精密度时,那就只好依靠研磨的方法了。因此在研磨上下了苦功,结果终于掌握了研磨陶瓷的特殊技术。由于这项技术,在15年前开始制造光导纤维接续用的部件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利用光导纤维的通讯已经遍及全世界。这种方式不是用过去的那种铜线,而用玻璃纤维的材料制成导线,使光从中通过来进行通讯。

这种光纤维的原料是石英。把石英熔化做成纤维。但一次不可能做成很长的线,中间必须要联接。联接时,光轴(光经过通路的轴)与光轴之间的光的波长必须一致,其精密度不得相差亚细微粒——即万分之一毫米。各种研究机关都来委托我们能否用不受温度变化影响、不磨损

的陶瓷来试制这种接头。

他们的要求是，陶瓷上开一个头发丝细的小孔，外侧必须能紧密衔接，不得相差亚细微粒。而且还附加条件说：“一个接头要花几百万日元是不行的。将来必须花几百日元就能制造。”这种加工方法实在太难了。但做买卖是要争取时间的。经过反复多次试制，终于开发了专门的制造机械。现在可以使用这种机械，像纺织机那样摆列几千个纺锤，通过自动运转，生产光纤维的接头——陶瓷圈部件，出售给全世界的光导通讯的企业。

看到良渚遗迹的玉器，使我联想到我们艰苦奋斗的历史。像透雕中保持直角、雕刻进纹样这样难度很大的工艺，我们是让既无资金又无机械的中小企业去承包的。所以看到那样的玉器，就自然地想到那是怎么制造的。

古代遗迹的研究会导致 未来的技术——梅原

没想到看了古代中国的玉器，还会听到贵公司为什么获得成功的说明。

我一直想请稻盛董事长提供资金，也想过请您参加研究工作。过去的调查是以考古学家为中心的，也请过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参加，但像研究材料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专家，基本上没有请过他们参加。第一流的科学家从材料的角度来研究遗迹出土的玉器，还没有过先例。

但是，听了稻盛董事长的话，我感到这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在玉石上开孔是很不容易的，连现代的文明都很

难做到,但这种技术在良渚就曾经有过。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技术呢?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在日本的考古出土文物中,我想值得从材料角度研究的大概不太多。但这里出土的玉器技术水平很高,所以可以首次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可以期待产生重大的成果。

这次即将开始的良渚遗迹的发掘,我想大体上是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日本进行协助的主要是在中国还没有的技术方面——如花粉分析、地下探索的雷达等。从陶瓷的技术方面来进行研究,我觉得也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顺便说一下,像稻盛董事长这样大企业的经营来参加古代遗迹的发掘,是极其少有的。日中联合研究本来就具有划时期的意义。这次如果你们也能参加研究,那将有双重的划时期的意义。

而且,如能从古代技术研究中获得启发,开发出新的技术,我觉得那就太好了。从企业方面来说,如能从5000年前的良渚遗迹的玉器中获得新的设想,产生下一代的新技术,那是很了不起的。

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稻盛

像这次良渚遗迹这样日中联合发掘的事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国与国之间既有经济援助,也有通过国际交流基金等机构在进行文化交流。但在民间当然也可以进行经济的交流,也可以进行文化的交流。这次由于梅原先生的推荐,能参加这种自愿的非谋利性的事业,我感到很高兴。我认为应当有更多的这种诚心诚意、尊重对方的立

场、相互合作来探讨人类共有的财富的活动。

日本的民间企业如能以这样的事业为起点，不光是口头上，而是以行动在日中之间架起桥梁。那么这种桥梁架设得愈多，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就会愈加亲密。经济交流愈多，这种文化交流也会愈加频繁。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交流带有利害关系，往往会发生矛盾纠纷。文化交流不会是这样。

不能忘记礼节——梅原

我觉得现在日本与欧美之间的摩擦在文化方面是非常大的。在这样的时代，我认为今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与近邻的中国友好相处下去。对于日中两国来说，两国互相援助在安全保障上是重要的，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当然也是重要的。抛开邻近国家的问题，就不可能考虑其他重大问题。

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益重要，但文化关系的重要性也不亚于经济关系。不仅要认识两国文化相互的共同性，而且要像这次良渚考古那样，共同研究和保存日中两国共同的文化——水稻文明所产生而被掩盖的城市遗迹——这样的文化友好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要说水稻文化，中国和日本都是水稻文化。对于这种水稻文化所产生的优秀的城市文明，不仅有学者来参加，而且有日中两国各方面的人士来合作研究，我认为这在考虑今后日中关系时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中国与外国共同进行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是

很艰难的。中国过去一度成为殖民地式的考古学研究的牺牲品。欧美和日本的考古学家跑来发掘,把出土的文物拿到本国去了,或者只出一点点钱就买了带了回去。这样的发掘,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只是白白地丧失了中国重要的珍宝。所以今天中国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就良渚遗迹的玉器来说,实际上过去也有过被盗掘的历史,五十多年前就被盗掘过。在战前,最好的东西一般都流入英美,次一点的流到日本。当时一直把良渚的玉器看作是汉代的東西,所以以“汉玉”的形式流入日本。以后考古学取得了种种的发展,才知道这种玉不是汉代的玉,而是距汉代二三千年前、距现在四五千年前的玉。这是距今大约15年才知道的结果。

因为在考古学上有着这样不幸的历史,所以中国方面必然要非常警惕,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日本方面最初提出共同发掘时,在说法上也是很谨慎的。我们的说法是希望协助中国方面发掘。因为我们有各种新的机械,可以使用这些机械,并且提供新的技术,另外还提供资金。所以说是想请中国方面发掘。

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发掘之后,发现了宝贵的东西,如果没有能很好保存的设备,那就失去了发掘的意义。不负责任地把那里变成无人管理的状态,那将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感到中国方面的意思不仅是发掘,还希望有保存机构,希望在保存方面也能协助。我认为如能出土很宝贵的东西,也应当在当地保存。我曾经说过,当地中国人创造的东西,还是请当地保存。我认为日本方面应当考虑到这些。共同发掘、共同保存虽然是没

有过先例的，但我认为，如果能这样诚心诚意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彼此是可以互相理解信赖地工作的。

我认为中国是长时期蒙受考古学上不幸的殖民地式的灾难的国家之一。所以我觉得考虑一下这样的历史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当谦虚地、彬彬有礼地来进行共同发掘。这样的想法不只是对发掘而言，在和中国交往时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如果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过去对待中国的种种行为，就会产生一种傲慢的情绪，也是很危险的。我觉得“不要忘记礼节”是非常重要的。

“善事”会有天地相助——稻盛

我们访问良渚遗迹的时候，天气非常好，百花盛开，那样美丽的风景简直叫我感到“桃花源”也不过是如此吧。我心里想，这是天和地都在欢迎我们，极其美好的太古遗迹一定会出现的。其实这是偶然的現象。但是，让我随意地解释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为了日中友好，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心想要给予协助。由梅原先生倡议，我由于深受感动而参加了进来，所以桃花、梨花都绽开出花朵，好似在欢迎我们的这样一颗“心”。

我还想到“想善事”、“做善事”会有天地相助这句话。其实这也是我从事事业时唯一的方针。我经常想“善的思想”、“善的心灵”会有天地相助的。

另外，我还经常跟公司的职员们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是过去努力的结果，将来要靠今后的努力。”我的想法是，从个人方面来说，以前所作出的努力并不能打开明天

的前景,明天是要靠今后的努力来缔造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躺在以前努力的成果上睡大觉。如果从更广泛的全人类的观点来考虑这句话,可以这么来理解:现在的我们要立足于过去的历史之上,未来要靠我们今后干什么来决定。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不能忽视过去,不能丧失学习过去的劲头,同时不能忘记对未来的希望和努力。对于生活在现在的我们来说,我认为过去和未来都是不可缺少的支柱。

第四章 争取心灵的教育

——稻盛和夫、梅原猛

为什么出现了末世的现象——梅原

今年(1995年)3月到4月的两个月期间,发生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首先是日元升值,以1美元接近80日元的势头在迅速提高。人们都在议论这种日元升值的趋向好似永无止境。我认为这对日本的经济是一个严重问题。

另外,有关奥姆真理教这个新兴宗教集团的问题已经表面化。其结果如何还不太清楚。总之在上班时间的地铁里放了沙林毒气,死伤了大批无辜的人。据说这与奥姆真理教有关,警察已着手搜查,奥姆真理教的真相即将暴露于世间。这也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此外,在统一地方选举中,青岛幸男和横山诺克分别当选为东京都和大阪府的知事。这也是按过去的常识无法想象的现象。

仅就这三件事来看,都是根本无法用常识来判断的,使我感到逐渐出现了末世的现象。

对“专制政治”的担心——稻盛

我也和梅原先生一样，感到按过去的常识无法想象的事态正在不断地发生。

从经济方面来看，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土地和不动产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股票的行市也下跌了。其结果，金融界乃至其他企业的资产都受到损耗，产生了总额达几十兆日元的所谓“不良债权”。可是，有没有因此而不断发生大规模的破产呢？没有。这是由于不良债权如果全部都公开出来，金融机构就会破产，连一般的企业公司也会破产，所以全部都捂盖了起来。

比如说，贷了款的公司如果连贷款的利息也无法偿付，当然要没收其抵押品。而现在尽管利息付不出来，金融机构仍在等待。如果为了收取利息而没收抵押品，被没收的公司就会垮台。公司一垮台，金融机构也要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把它捂盖起来。股票的实际损失据说高达几十兆日元，为了不使它暴露出来而变成一个问题，也同样捂盖了起来。这都是常识难以想象的对付办法，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不负责任的应付措施。

泡沫经济的崩溃产生了这些后遗症，又碰上前些时候的阪神大地震，关西地区蒙受了10兆日元以上的损失，这时又遭到日元升值的袭击，经济界的现状是背负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重重负担。

就在这样的时候，在东京这样大城市的地铁里被撒放了沙林毒气，给日本的安全神话带来了重大打击。奥姆

真理教这样一个具有常识无法想象性质的宗教，在这里露出真面目。另外，这次统一地方选举的结果，被人们认为毫无行政工作经验的两位议员当选为东京、大阪日本两大城市的长官。确实感到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在不断地发生。

不过我认为，这些异常的事态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如出一辙发生的。这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自身制造出来的现象，责任主要在领导人。

比如拿泡沫经济后遗症所产生的巨额不良债权的问题来说，因为这个问题一旦暴露出来就会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令人感到是想零敲碎打地解决，所以要捂上盖子，领导人谁都不想负责任。现在的状况是谁也不负责任，也不实行根本改善事态的政策。人们对此感到愤怒乃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有人说出像过去的新左翼或红军派所叫喊的那样的话，即使出现了集中表达人们的不满和愤怒的组织或集团，尽管它是新兴宗教的教团，我觉得丝毫也不值得奇怪。

领导人高高在上，过着优裕的生活却不负任何责任。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反动，作为一个怪胎而产生了新兴宗教的势力扩大和异常行动，我认为这和东京都知事青岛、大阪府知事横山的产生都是有关联的。

就都知事、府知事的问题来说，那是群众对政治家非常不满，在都知事、府知事的选举中投出一票，抛弃了行政官僚出身的候选人。原因是现在的政治家都推脱责任，许诺的事不兑现，在国会的答辩中使用的尽是模棱两可的语言。相比之下，群众感到青岛、横山还是用自己的语

言在说话。青岛和横山还是愿意认真负责的。他们作为行政官员也许没有多大才能，但他们和平民百姓多少还有些共同语言，不想敷衍塞责，所以不满的群众选择了他们。为什么只选他们，我觉得有着群众极大的不满和积愤的原因。

在这样的时代，我最担心的是出现“专制政治”。大概由于群众希望使现在这样混乱的社会正常化，所以渴望“出现哲人”。

这种渴望哲人政治的呼声一旦高昂起来，就会令人感到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在德国抬头时的情景。政治一乱，世态一乱，由于为了使其净化而渴望哲人政治，就有可能出现实行荒谬的专制政治的人的危险性。如果出现了专制政治，我觉得情况就非常严重了。我认为现在的经济界、政界、官界都应当向领导人呼吁：要觉醒起来，一切的言行都要负责任。

另外，对于日本人来说，那种能够满足他们的理想、希望和正义感的社会，恐怕正在彻底消失了。

因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既然是一个没有正义感的社会，那就自己起来自卫，自己独自生活下去。仅凭自己的论理，毅然起来与这个正义行不通的社会斗争，这是很可悲的。

对应的办法只有建立 “新的资本主义”——梅原

我反对奥姆真理教所说的“世界最后的战争”(希腊

语Harmagedon)思想,但世界进入了困境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对应的办法只有如第一章里所说的“回归资本主义的原点,建立伦理的道德的资本主义”。

听一听奥姆真理教代言人所说的话,他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巧妙地撒谎,他们两面三刀,满不在乎地信口雌黄。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起了政治家在国会答辩或国会传唤证人时受到大家追问的场面。这些前言不搭后语,互相追问的政治家的言行,简直就是奥姆真理教代言人的翻版。我心里想,像政治家这样了不起的人物这样说谎不脸红,那不等于说撒谎也没有关系吗!?咱们不是可以更好地撒谎吗?!

年轻人一定会由此而产生疑问:现在的世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失去了精神的原理就会一切“向钱看”。那里既没有理想也没有浪漫,因此企图在那样的邪教(我认为是邪教)中寻找理想和浪漫。

马克思主义一度曾是这样的正义的源泉,同时也是青年的理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以后,这些青年认为,这一切都幻灭了。因而以宗教的招牌打出的理想国就抓住了青年们的心。我觉得这是极其自然的。我认为现实的社会还是应当让人们充满理想和希望,应当满足人们的正义感。

就宗教这一点来说,不论是亲鸾^①还是法然^②,真正

① 亲鸾(1173—1262),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开山祖师,号见真大师。

② 法然(1133—1222),日本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号圆光大师、明照大师。

的宗教家在他们生前都没有建立寺院或教团，是信徒在他们死后才建造了巨大的寺院，形成了教团。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就忙于干这些事情，可以说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家。

其实法然等人如果要筹措钱的话，要筹多少都是可以筹到的。但他直到死都是在草庵中渡过的。像亲鸾一生都过着在人家寄食的生活。本愿寺并不是亲鸾建造的，是他的曾孙觉如^①奠定了基础。而且本愿寺在创立的当时，大家都还很贫苦，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莲如^②出现之后才突然壮大起来。所谓本愿寺教团，实际上是觉如根据亲鸾的思想创立的，莲如使其获得飞跃的发展。

拿耶稣基督来说，他也只有十几个门徒。但据说其门徒保罗^③一天就收了一百名门徒。所谓宗教，本来就是这样的。把自己供为神，收取许多钱，我认为并不是宗教。

说实在的，并非宗教的宗教在社会上蔓延，我觉得归根结底恐怕有着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影响。所以拿发生了问题的奥姆真理教来说，令人感到其思想中掺入了一些好似左翼的思想，有着一一种近似于红军派的思想。例如它使用了美帝国主义、国家权力之类的词。

不撒谎是最起码的道德——梅原

自己说过的事要实行，如果错了就说错了——我希

① 觉如(1270—1351)，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高僧，建造本愿寺，奠定本愿寺教团的基础。

② 莲如(1415—1499)，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高僧，本愿寺教团由于他而获得飞跃发展，被称为该教团的中兴之祖。

③ 公元1世纪人，生卒年月不详：基督教的最早传教者，在各地建立了教会，后在罗马殉教。

望现在的领导人能做到这样最普通的事。

苏格拉底^①可以说是最早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之前有些人自称是诡辩家、智者。所谓诡辩家，就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站在A方或反A方同样都可以辩论。这样的诡辩家教授辩论术，曾经博得人们欢迎。原因是政治需要颠倒黑白的辩论术。

这和今天的政治家完全一样。符合自己的利益时主张A，立场一变就主张反A，而且辩论起来提出的主张很有说服力。苏格拉底通过对话揭露了掌握这种辩论术的诡辩家的无智。因而他宣称自己不是诡辩家，不是智者，而是“爱智者”。这是最初的哲学。我认为哲学家应当回归其原点，恢复语言的权威。

也就是说，道德的原点是“不撒谎”。顺便说一下，阿伊努人^②是不撒谎的。为什么不撒谎呢？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身上附有灵魂。撒了谎，附在自己身上的灵魂也知道这是谎言。所以撒谎也没办法撒。如果非撒谎不可的时候，就说“不知道”。

不仅是阿伊努人，很多民族都有着不能撒谎的意识。但随着文明逐渐地发达，对撒谎感到反感的意识慢慢地淡薄了。我小时候母亲就严格地教导我：“不准撒谎！”可是现代这样的精神正在消失。这表明人已经丧失了伦理的基础。

哲学家尼采^③用德语说过“Redlichkeit”这个词。这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约469—公元前399)，与希腊哲学家。

② 居住在北海道、东北地方的日本少数民族。

③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是诚实，即不撒谎的意思。并说这是“最后的道德”。意思就是说，基督教所培育的各种道德正在不断地破灭。这个道德如果破灭就再也没有道德了。这个最后剩下的道德就是“Redlichkeit·不撒谎”。这个最后的道德在今天的日本已处于严重的状态。

我的一位前辈(他是京都人)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梅原干得很不错，就是太过于说真话。”叫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想：“我对京都人还是不习惯呀！”我出生于仙台，是所谓的虾夷^①，所以确有太过于说老实话的一面。不过，我认为不撒谎是道德的基本和核心。

不撒谎的智慧——稻盛

是这样的。不光是政治家的世界，看一看政府官员中间，也都是诡辩家们在横行无阻。比如东京的两个信用组合的胡乱经营问题，人们怀疑大藏省的官员是不是受了信用组合经营者的吃请。

当时进行了种种的追查，甚至责问他们说：“你不是去过那儿吗！”“你不是受到这样的款待吗！”话已经说到这种地步，他们仍然嘴硬说：“绝对没有这种事。”于是把证据摆到他们的面前，他们才说：“这样的程度，我并不认为特别不好。”

如果不认为不好，那就应当首先说：“有这么回事。不

① 日本古代居住在北海道东北地方的土著民，即阿伊努人，梅原出生于仙台。仙台属东北地方，故称自己是“虾夷”。

过,我并不认为不好,所以接受了那样程度的款待。”而他们却说:“没有受过什么款待。”最后事实揭发了出来,才态度一变,说什么“这样的程度,我认为不是问题。”在A情况下振振有词地辩解,到B情况下仍然振振有词地辩解——这样的态度和诡辩家一模一样。这样的状况可以说和希腊时代没有什么不同。我觉得社会之所以混乱,应该说也和政治家、高级官僚似乎理所当然地采取这种诡辩家式的态度有关。

想到这些,不由得产生一种“进入了混乱时代”的感慨。于是偶然联想到我初次步入社会,开始工作时的情况。

我是从鹿儿岛来到京都当职员的,在公司里从事技术工作,当时我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跟我的公司的上司在技术问题发生了争论,我决定辞去工作。与京都的一些朋友创立了现在的“京瓷”公司的前身——“京都陶瓷”公司。

公司的核心人物是N先生。他由旧制新泻高等学校进入京都大学工学部电气科。他虽然出身于新泻的寺庙,但是个很富有浪漫色彩的人。在新泻高校时代和一位比自己年岁大的医生的太太坠入情网,手拉着手私奔到京都。他是这样的一个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有着宗教的信仰,所以我一直对他很景仰。我负责京都陶瓷公司的经营之后,工作上必须要发出各种指示,这时我就去跟他商量,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稻盛,不能说假话。但也不必说真话。”

我听了这话,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我从小父母也是

严格教导我绝对不准撒谎。我当上了经营的负责人之后，心里还是这么想：说谎可不行啊！可是，在经营上有关企业的机密和人事等问题，有时会出现很难说真话的情况。我想我大概是为这些难题苦恼时而跟他商量的。他的这种回答在最低限度上贯彻了“不撒谎”的态度，但又不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这样就可以求得局面的打开。

如果尽说真话，那就会有陷于四面树敌的危险。有时为了不想被人家说“那儿不顶用”，于是就想用说假话来弥补。这些情况谁都会遇上的。即使在这样的時候也不能撒谎，但也没有必要非说真话不可。如果是被人逼着问：“是这样吗？”因为不能撒谎，所以必须要回答说：“是这样。”但也没有必要明知对方听不进去，还把真话统统地说出来，而使自己陷于困境。

刚才梅原先生说，阿伊努人在不得不撒谎时，只回答说“不知道。”这里有着“不撒谎的智慧”，我认为是至理名言。

我希望政治家和官员们起码能懂得这一点。

痛感“心灵教育”的必要性——梅原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实业家和学者还略有不同。我觉得学者什么都说真话也能活下去。但实业家什么都说真话那就很难活下去。我年轻的时候太过于说真话，所以树敌很多。上了年纪之后，才痛感到需要有既不撒谎又不说真话的智慧。我完全理解稻盛董事长所说的话的意思。

在考虑“最后的道德”——“不撒谎”的道德——的时

候,还会出现一个教育问题。我的母亲是一个严厉的人,她曾经把贝原益轩的《女大学》^①里所说的理想的女性画成画。她是我的养母,和我虽无血缘关系,但她对我的管教很严厉,常说撒谎的人是最低劣的人。我一说谎就受到严厉的责骂。有一次我由于说谎而被关进了储藏室。那个漆黑可怕的储藏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现在我还撒不好谎。我一说谎脸上马上就表露出来了。这是由于忘不掉那个可怕的储藏室的缘故。现在的妈妈虽然有由于成绩下降而斥责自己的孩子的,但基本上没有由于撒谎而认真地批评自己的孩子。这种道德教育不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里都在逐渐消失。我认为这里大有问题。

道德教育——如果认为道德教育这个词不好,改称“心灵教育”也可以——在学校里不进行,家庭里也不进行。在这样的状况下培养出的人缺乏对道德的感受性,丝毫不值得奇怪。我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缺陷。

偏向智育的教育的积累带来了 混乱——稻盛

现在的教育已变成一种仅仅灌输知识的形式。这种形式正在不断地膨胀。而关于心灵的作用可以什么也不教。即便教,最多也只是教一点不彻底的心理学。而且心理学所教的心灵作用,只是心灵作用的一部分,极其表层

① 贝原益轩(1630—1714),江户前期的儒学家、教育家。著有《养生训》、《慎思录》、《女大学》等。

的部分。所以即使很好地教了心理学,那也还是不够的。我认为现在进行的是极其偏颇的偏重知识的教育。

遗憾的是如果要把教育的对象引向心灵的方向,立即就会出现反对的意见,把它改换成道德的词,硬说这是旧制度的方针。而且现在的状况是,负责教育的人却不能说服反对的意见。教育本来应当是智育和德育两方面取得平衡,而现在却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人,去说服那些高呼“不准复活战前的教育”的持反对意见的先生们。因此教育彻底偏向于智育。这样就产生了现在末世似的世态。我觉得是战后50年的积累——日本在最近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的积累,产生了今天的社会现象。

梅原先生已经70高龄了,还要一心向善。尽管这么做有些困难,但这种勉励自己一心向善的态度,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做起来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但是,正因为如此,尽管有些困难,还是需要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朝这方面去努力。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年轻”的表现。梅原先生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感到您很年轻。一般人上了年纪就变得贪婪起来,显得丑陋。

“心灵教育”不是国家主义的道德——梅原

我想我是因为条件较好,所以才想到这些问题。我总算还不愁吃穿,而且还得了各种奖,所以也就没有那种“无厌止地追求世俗利欲”的心情了;关于个人的事,我觉得再不需要什么了。

关于道德的问题,再补充一下。以前我对所谓的道德

并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这还是和战争期间把“忠君爱国”的道德强加给我们，而战后这种道德彻底崩溃了有关系。

也就是说，关于道德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总的来说是持怀疑的态度。有过战争体验的人，不论男女，或多或少都是道德的怀疑主义者。所以很多父母都认为，与其把道德强加给孩子，不如让他们自由地成长，在家庭中不进行道德的教育。现在学校里总算划出了道德教育的时间，但实际上基本没有进行，而且也没有充实的道德的教科书。截至目前为止，就是这样的状况。

不过，如果对道德教育这个词有反感，我觉得可以称作“心灵教育”。进行“心灵教育”，我认为决不是什么国家主义。人生活在这个世上需要一个重要的“道”。完全不教这个“道”就进入大学，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我觉得现在很需要认真地考虑“心灵教育”。文部省应当狠下决心，集中全国最高的智慧，研究“心灵教育”，讨论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心灵教育。

需要有包括心理学、宗教和伦理 的综合的德育——稻盛

关于“道德”这个词，由于战前的教育中有着错误，确实有一种反感。梅原先生把它改称为“心灵教育”，我觉得很有道理。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曾经报道过一个儿子打死当过教师的父亲的事件。这说明了现在的教育是多么地荒废。

另外,从这次的奥姆真理教的事件来看,也可以了解到有多少在心灵问题上饥渴的年轻人啊!那么多进过最高学府的优秀青年,却被拉进了以诡异的神秘性为幌子的宗教里。他们具有可以进入“好学校”的学习实力,但恐怕一点“心灵教育”也没有受过。

现在人们都渴望着所谓的“心灵教育”,所以连奥姆真理教那样歪门邪道的“心灵教育”也有吸引力,把人们拉了过去。现在没有真正的“心灵教育”。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在连环画的世界,漫画的世界里寻求“心灵教育”。好像是为了满足这种要求,神秘的宗教连环画(当然也有正经的宗教漫画)在商业性的出版界竟以几百万册的发行部数出版。一方面是这样的状况,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中又没有正经的“心灵教育”,这确实是奇怪的现象。

正如梅原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也希望能认真地对待“心灵教育”。比如说,心理学也是“心灵教育”的一种,宗教当然也要包括进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教那些意义深奥的宗教学,而是说要介绍作为世界宗教而存在的宗教,指出它们的教义,告诉人们它们之间的区别——由于产生的年代和地方的不同而有着这样的区别,这样一来人们就有了可以阻止被那些不好的新兴宗教拉过去的知识。

另外,了解一下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佛教、回教、印度教的教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就会知道它们都是两千多年前成立的。这么说来,我想人们会产生一种两千年间人类没有丝毫进步的感慨。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提出

一种超过两千年前的教义的宗教。这对现代人的傲慢应当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比如在哲学方面，如果就希腊哲学或中国的古典哲学而言，至今还没有提出过一种超过它们的新哲学，那就等于说人类并没有多大进步，最多只是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进步了。这样来考虑的话，在年轻人当中也许会有人出来说：“好，我来搞哲学。”“我来学习宗教教学”。如果能够这样，我期待着在心灵的领域，即精神科学方面能有巨大的发展。

因此，宗教以及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课程都要列入“心灵教育”内。现在已经是集中日本的英知来考虑这些课程的时候了。

另外，日本的情况存在着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也可以说是受着一种框框的束缚吧。教育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在某种框框里成立的。在研究工作者的领域里存在着一种近似于徒弟制的东西，如果老师说白的东西是黑的，学生也说是黑的，那就是优等生。于是说“白的就是白的”的人就要受到排挤。

但欧洲人(包括美国人)就没有这种框框，所以有一种可以产生自由思想的素质。就这一点来说，可以称之为“知性的野蛮人”。他们在知识方面也希望有这种开放和自由。起码我是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日本的优等生不可能从框框里迈进一步。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们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具有巨大活力的野生动物大不一样。

培养没有道德感觉的知识分子 的后果——梅原

“知性的野蛮人”这个词好！我觉得这是稻盛董事长在说自己。您看怎么样？稻盛董事长是萨摩的隼人^①，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野蛮人吧。我是道道地地的野蛮人，以学生的身份公然和大学者顶撞，喝醉了酒把前辈踢翻在地。因此被排挤在外，最后自己建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因为是野蛮人，确实吃了苦头。不过，我觉得吃点苦还是好的。如果变成了研究室里培养的驯服的动物，那恐怕就糟了。

现在上了年纪，不干年轻时那种粗暴的事了。不过，行为上虽然多少有点绅士的味道，但思想上还必须经常是野蛮人。既然是京瓷的董事长，那就必是有风度的董事长，但内心里还是有着知性野蛮人的精神。欧洲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基督教的道德，但在知性方面是野蛮人。可是日本很少有知性的野蛮人。重视划一的方针，就很难培养出野蛮人。

谈一谈另外一件事。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组织临教审(临时教育审议会)，试图改革教育。从愿望上说，我觉得他有先见之明。但当时方针不明确。前首相中曾根本身并没有很明确的教育理论，参加会议的学者令人感到基

① 萨摩是鹿儿岛部分地区的古称。那里以前住着叫“隼人”的少数民族。稻盛是鹿儿岛人，故戏称他是“萨摩的隼人”。

本上也没有关于教育的独特的理论。

不过,当前最需要的恐怕还是究竟如何考虑“心灵教育”,而不是建立临教审。稻盛董事长说了,不仅是道德,也要教宗教。我认为需要有这样的观点。从小不教授宗教,就没有免疫力,就会给被邪教拉过去留下余地。我觉得培育不给伪宗教拉过去的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让学生了解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就不会被伪宗教拉过去。

一说起宗教教育,比如净土宗^①办的学校,一般认为就是要进行关于净土宗的教育。我觉得在公立学校里需要教授佛教的各个宗派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世界宗教的特征和问题等。

另外,恐怕应当重新考虑今天日本的教育已经变成填鸭式教育的现状。所谓填鸭式的教育,是一种培养很好地理解和应用已经完成的学问的人材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从新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不考虑超越常识的问题——独创性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欧美的教育有其优点,能培养思考新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教育,特别是今天所谓的偏差值教育^②,只能以制造知识分子而告终。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创造性,虽然能掌握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但别的都不会。所以一碰到困难的局而就束手无

① 高僧法然所开创的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

② 是一种以特殊的计算方法评定学生成绩优劣的方式。后来由于绝对化,甚至影响到学生的升学,1993年已废除。但在补习班等入学考试等方面仍有影响。

策。而且根本没有道德的感觉。我不能不感到日本只能培养这样的人。

我给日本的教育评个分数：小学90分，初中80分，高中70分，大学60分，研究生院只有40分。学校层次愈高愈糟糕。

本来愈是高等教育愈要求有创造性。可是偏差值教育的优等生往往是缺乏创造性的人。这恐怕首先是由于教师就按毁灭创造性的方针在进行教育。如果不是在同一个大学里一直深造下去，作为一个学者是不可能得到好的地位的。因此在大学4年、研究生院硕士课程2年、博士课程3年合计9年期间，必须在同一个教授指导下学习。如果这位教授是平庸的，那可就不好办了。如果不能让这位教授满意，学者就很难当下去。有创造才能的人如果不否定自己的创造性，也不能作为学者生存下去。不仅如此，即使教授不平庸，9年期间跟着同一个教授，学问的天地也是很窄小的，必须从这些地方根本地加以改造。

“心灵教育”对解决环境问题 也是重要的——稻盛

进一步来考虑，我觉得包括道德、心理学、宗教等的“心灵教育”对于环境问题也是有意义的。地球已处于危险的状态——早已敲响了这样的警钟，最近已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如果进行了“心灵教育”，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也就不必惊慌失措，是可以慢慢理解的。

例如梅原先生所说的“共存与循环”的哲学。这是一

种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考虑现代社会状态的哲学。如仅就环境来说,我认为我们要重视由“共存与循环”所形成的自然环境。

如果很好地实行了“心灵教育”,我想就可以通过实践来理解共存的概念、循环的概念。大家对“共存与循环”的哲学产生了共鸣,即使付出一定的牺牲,也会认为“我们要做应该做的事。”可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心灵的教育,所以很多情况下完全从自私的角度来考虑环境问题。完全是自私的,发展下去,自私和自私就会互相碰撞。这样下去,不用说共存,连循环的思想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环境问题之所以发生混乱,看不到光明的前景,我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考虑一下共存的哲学,我认为与对“心灵”的探索有关联。社会是由于有着对方才成立的。所以构成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如果把自己的自我无限地扩大,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需要有对对方的关怀。不仅是对人,就是对其他动物、植物等众生,极端地说,甚至对待无生物,也要有这种亲切关怀。要想在我们的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同一切众生共存。

我觉得以上可能就是梅原先生所说的“共存”哲学的要点。您还说东方共存的思想强烈,应当把东方哲学教给西方。不过我觉得凭西方的感觉也是可以充分理解“共存”的。

比如人一旦遭到某种恐惧心理的袭击,细胞的免疫力就会降低,容易受到细菌等的侵袭,这在现代医学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像我这样的经营者,在现在这样不景气

的时期，如果老是担心公司明天会不会破产，那就会得胃溃疡之类的病。这种胃溃疡并不是物理性引起的，而是由于精神劳累，归根结底是由于精神紧张而导致了胃穿孔。

这在现代医学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心灵的作用会直接在肉体上引起某种现象，这在现在的医学界已成为共同的认识。按西方的感觉，从这方面来考虑什么是“心灵作用”或“心灵”时，不是可以得出“不仅是人如此”的结论吗？

比如看一看院子里种的树，在吐芽发叶的时期，树枝上会逐渐地长出新叶。樱花含苞之后，两天左右就会开花。看到这种现象，认为植物似乎也有心灵恐怕也不值得奇怪，也就是认为花儿并不是随便开的；植物也知道四季，知道现在是开花的时候了，所以樱花在春天开放。这不是也可以称之为“心灵的作用”吗！科学的解释则是：“植物对温度、日照时间有反应，所以开花、发出新芽。”我觉得可以把这总称之为“心灵”。

所以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这是因为植物具有一种像光传感器那样的机能”，“所以能感受到日照时间的长短。”可以把植物的细胞所具有的能感受到某种东西的作用总称之为“心灵”。人的细胞也有这样的作用，我们把这称之为人所具有的“心灵”。仅就一切凭大脑来思考来说，那并不是“心灵”——如果能这样来观察问题，我觉得那就会对自然产生怜爱和亲切感，就会懂得一定要和自然界存在的一切众生共存的道理。如果能够这样，我感到环境问题也会归结到梅原先生所说的“心灵教育”是头等大事的结论上。

坚持自己的欲望就不可能 和他人共存——梅原

打个比喻来说，一棵树必须要尽量地吸收阳光。所以，一棵树究竟向什么方向伸出枝杈，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和您的京瓷公司决定在什么地方建分公司、在什么地方造工厂是一样的。看一看树木的枝杈伸展情况，那就是每一时期所下的决断。把枝杈伸展到不恰当的地方，说不定树木有时会枯死掉。所以树木朝各个方向伸出枝杈而活下去，也可以看作是这棵树有着“活”的意志，是它多次反复下着自己要活下去的决断的结果。说不定它还会反省自己：“哎呀，那时候朝这个方向伸出枝杈就好了！”

正如稻盛董事长所说的那样，“心灵教育”中也应当包括如何和他人共存下去的主题。依我看，如果把自己的欲望绝对化——换个说法，也可以说坚持自己的欲望——那就不可能和他人共存。对他人的爱、关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近代的道德仅仅如此而已。但还要说一点，对动物也要关怀，这也是共存。另外还有与植物的共存。我认为应当考虑到这样的深度，不仅是和人，还要谋求和其他一切众生共存。这一点在东方的伦理中有着容易接受的基础。东方的伦理中这种思想要比西方的强烈得多。

我们从西方学到了很多。近代科学的合理精神就是从西方学来的，我觉得今后还有许多东西必须要学习。但是，对自然应有的关系和思想，恐怕应当反过来由

东方来教导西方。我是这么认为的。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忘了这样的文明的传统，今天的日本受自私——自我——的欲望绝对化的思想的统治比西方更严重，从而令人感到已经忘记了与其他生物共存的精神。

学术的领域应当开放——稻盛

另外，广泛地来看教育的领域，日本的学者和经济人的协作是很罕见的。前面已经说过，我觉得这是由于在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中有着所谓士农工商的阶级意识的缘故。学者方面有着一种“士不饮盗泉之水”的思想，以清贫为骄傲。他们认为自己和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不一样。正是这种自豪感支撑着他们在清贫的生活中仍然埋头于学问。由于有着这样的一面，所以也不能一概地说这不好。但是，这样的思想也确实妨碍了产业与学术的协作。另外我觉得学者们由于受到战后左翼思想的影响，总觉得资本家、企业家是剥削工人赚了钱，在心理上不愿同这些人一起共事。

这样的风气在日本一直延续了下来。但在美国不仅认为产业与学术协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认为不这么做，学术就不能进步。研究的计划自不用说，就连教授的职称也可以随意地加上企业的名称。我们的京瓷公司在美国的大学里就设有京瓷教授职称。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一个，凯斯维埃斯坦·尼札布大学一个，华盛顿州立大学一个，共有三个这样的职称。

十几年前捐助给美国大学的资金是100万美元，各个

大学都可设置京瓷教授职称，并配备一名助教，还有秘书，建立研究的体制。有趣的是有个大学还把本金100万美元增值到170万美元。他们不是把企业出的资金一下子花完，而是任命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运用这笔资金，用投资等获得的利润来养教授，让他们进行研究。不仅是设置教授职称，共同研究当然也是这么做的，有的学校就这样把本金增加了七成。尽管说这是美国式的做法，但没想到竟会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这种体制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每年还寄来收支清账。从资助方面来说，也感到有资助的价值。

另外，在美国的大学里，有着比如像“梅原讲堂”、“梅原教室”之类的建筑物，这是很普通的事。不论是州立大学还是私立的大学，都有许多冠以个人名字的设施。

前些时候，日本文部省也承认了冠名讲座，但承认的冠名讲座是一年使用几千万日元，五年需要多少？然而资助所需的钱，是属于用完花光的资助，日本的文部省虽说仿效美国，承认冠名讲座，但和美国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美国的方式好。比如说，资助100万美元——约1亿日元，把它加以运用。如果能使用其所获得的利润，本金并不减少，讲座式研究计划就会长期延续下去，弄得好，说不定本金还会增多，可以进行更多的研究。

另外，按现在这样用完花光的体制，可以说只有大企业才能参加。实际上出钱的都是大企业。我觉得可以不必这样，需要更加重视个人资助的体制。比如说，丈夫去世了，他妻子因为丈夫生前喜爱学术，想以丈夫的名字建立一个冠名讲座，这样的情况更加应该予以承认。包括丈夫

留下的房屋，如果有3亿日元的资产，拿出其中的2亿日元，建立一个比如叫“梅原”的讲座，这个讲座如果能够长远继续下去，对研究的人很有利，资助的人也会感到很欣慰，我觉得应当有这样的冠名讲座。

要做到这一点，大学有关人士的思想必须要改变。在日本，个人要想给大学捐助，学者当中必定有一两个人会出来反对，说什么冠上出资人的姓名，那是沽名钓誉的行为，大学是决不会同意的。我觉得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的气氛。

因此，大学真正需要钱，却抱着“给我送来”的态度来接受资助。但我认为，既然要人捐助宝贵的钱，起码应当高高兴兴地给人冠上名字。

人生最高的奢侈——梅原

冠名讲座全国大学只有二十几个。而且大的大学比较少。文部省虽然大力地鼓励，但还是很少，所以研究学者一般都为资金困难而苦恼。像我们那样的研究所采用冠名讲座的要比大学多。研究所一般是按所长的意思来管理。而大学有教授会，一拿到教授会上必定有一两个人出来反对。而且反对者一般都高唱左翼的公式化的论调，说什么决不能拿企业的肮脏的钱。这样一来，别人也就不太好反驳了。

我的话也许有点离题。看一看美国等国情况，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资本家最后都创办了大学，这也许是人生最后的奢侈吧。洛克菲勒创立了芝加哥大学，迪克大学是烟

草大王创立的。这大概是由于企业家也有着希望为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思想，而大学方面也有着乐意欢迎企业家的思想吧。日本的大学如果要干这样的事，立即就会遭到批评说：“干这样的事是为了给企业宣传。”企业和大学分离，我觉得是很不幸的事。知识分子和企业两方面的思想如不改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请允许我再就大学问题补充一点。日本的国立大学因受铁饭碗的保护，高喊反体制的教授很多。要办这样的事，我寄期待于对经营有影响的私立大学。我希望能出现一个具有伟大理念的私立大学。

建立的资产不过是暂时的寄存物——稻盛

现在情况不知怎样？总的来说，欧美是有不少企业家创办了学校，并为学术筹措基金，把挣来的钱归还于社会。比如钢铁大王卡内基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就把挣来的钱用于社会。卡内基没能上学，据说年轻时是在图书馆里学习的。在图书馆里学到的东西对他的后半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他把钱捐助给全美范围的图书馆。拼命工作挣得的钱是现世的寄存物，所以他想把这些钱归还于社会才死。他有着这样非常正统的思想。

在日本古代的伦理观中，也有金钱是现世暂时的寄存物的思想。不知道欧美的这种思想是否来自耶稣教？但我强烈地感到，在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中获得成功的人，似乎都有一种在死之前要把钱用于服务社会的思想。这也不是为了对付遗产继承税。遗产继承所纳的税款并不

多，他们是要把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从研究机构来说，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钱。例如就非常乐意接受卡内基建立的卡内基财团的援助。

日本则很少出现这样的企业家和实业家，这恐怕和没有这种体制有关。11年前，我筹措了股票和现金共200亿日元，想建立稻盛财团，开办“京都奖”的表彰事业。当时首先要得到政府机关的批准。而政府机关却为“是否批准”而犹豫。原因是征集很多人的捐款而建立财团是常规，用特定的人的钱建立财团尚无先例。结果我的申请虽然批准了，但在财团中的地位比较低。当然，这只是政府机关所认为的地位低。

政府机关所认为的质量高的财团，是从许多人那儿每人征集一点点钱所建立的财团。我没有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其实日本的经济团体每年都要建立一两个财团。这种财团是由某人来出谋划策，把谁和谁拉进去而建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把捐献簿拿到我们这儿来，要我们出几百万、几千万日元。我长期以来一直碰到这样的故事，产生了一种“算了吧！”的情绪。因为我觉得，建立财团的主要人物如果想当理事长或常务理事，那就用自己的钱去建立好了。指靠别人的钱，而且征收起来好像理所当然似的，然后由一部分人随意地控制财团，这不是有点不合情理吗！如果财团的目的很正确，那就自己来建立好了。所以我在创立财团时，丝毫没有征集别人的资金的想法，全部用自己的钱。

可是，一般是征集大家的钱来建立财团，现在我是独自付出牺牲来办，如果以为别人会说“你了不起！”那就完

全错了。人们会把这样的财团看得低人一等，而认为那些利用别人的钱财组建的财团才是理想的财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政府机关存在着一种猜疑心，认为个人建立财团的背后，一定有着创立人会随意来利用的目的。如果不是要隐匿自己的财产，是决不会拿出这么多钱来做傻瓜的。他们首先怀疑的是创立人是不是有什么企图。这样一来，想将个人的财产归还于社会的人自然就会少了。

人是不能带着钱财进棺材的。很多人都会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社会只要理解和支持这些人，并使这种善举得以体制化，我想个人捐款的义举会逐渐增多的。遗憾的是日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气候。

当前需要的三种教育——梅原

稻盛董事长将来能考虑自己来创办大学，那将是很意义的。即使给大学捐助，大学本身如果故态依然，那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学里有反对捐助的人，我想捐助了效果也不会大。反正是出钱，还是创办大学能使钱发挥作用，归还于社会。

美国创办大学的背后，我觉得有一个“要创造新事物”的理念。在今天的日本，战后可以说基本上找不到有这种理念的私立大学。这是不应该的。不按当年庆应大学、同志社大学创立时那样的新理念来办教育，我觉得日本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考虑日本的教育有三点不足。首先是缺乏创造性

的教育。日本的大学可以培养学习、吸收、咀嚼西方知识的人——即所谓的尖子，但是不能培养自己思考、自己行动的人。

其次是环境教育。这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的现代教育中都没有把它摆进去。最近有些大学设立了环境学科。但大多只是挂个名，以便于文部省通过。真正的环境教育要从儿童开始，在高等教育阶段，专门技术教育中也要进行包括环境问题的研究。

环境教育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意义是十分美妙的，教导人与自然进行交流；另一方面是要让人们知道现代文明如何破坏了环境。仅有前者则成了浪漫主义的教育，但仅有后者则成为一种知识的教育。环境教育应当是知(识)情(感)合一的教育。

最后是心灵的教育。从小就必须把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的所谓“善的生活态度”教给孩子。必须要告诉他们真、善、美是多么重要。

我认为现在需要这些新的教育。这些教育靠国家是很难办到的，我感到不从私立学校开始是很难的。从这一意义来说，具有哲学思想的人来开办新的学校，我认为对日本对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

末章 打开“困境时代” 的办法——梅原猛

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日本战后活跃的许多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赞同社会主义体制，倾向于支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即使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大多也发表过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充满好感的言论。在这样的潮流中，我曾经批判过社会主义体制，当然受到严厉指责。可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连我这个一向批判社会主义体制的人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阵营会崩溃得这么快。

面临这样的事态，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地说：“你看，果然糟了吧！”当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我也没有感到疼痛。但是，我的想法和那些为宿敌的失败而兴高采烈的思想家还不一样。一点是为社会主义阵营过早地崩溃而感到震惊。这是我真实的感想。另一点是预感到资本主义也面临着危机。

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现在是一

片高呼资本主义万岁，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将作为最后的胜利者而永世长存的呼声。苏联的崩溃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繁荣期间发生的。有的人高呼泡沫经济繁荣万岁。但是，对于欢呼资本主义体制胜利的人我不敢苟同。相反，我有着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资本主义也处在一种不美妙的状态。

实际上处于泡沫经济繁荣中的资本主义，已处于无能为力的危险之中。当然，比起社会主义一些国家，生活条件要好一些，但是，并不值得高举双手欢呼。必须看到资本主义也漂浮在极其危险的海域。继社会主义崩溃之后将发生资本主义崩溃的预感，是不可否定的。

这一想法——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感——现在仍然继续存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与年俱增。显示资本主义危机的征兆，令人感到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而日益明显。但愿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将发生资本主义崩溃的预感不会成为现实。但不能不说时时刻刻都在增强其真实感。

探索“回归原点”的时代

不仅是我对资本主义有危机感。通过这次对谈，感到京瓷公司的稻盛董事长也有着同样的危机感。稻盛董事长是第一线上的经营者。我理解他认为克服危机的方法是“回归资本主义原点”的观点。用我的话来说，则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化”。这个结论是从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是在于道德上极其颓废这一认识而得出的。

稻盛董事长认为“要回归资本主义原点”的思想，我

认为是很对的。马科斯·维贝尔曾说过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算盘”。西欧初期的资本主义总算一只手里还拿着圣经。这“圣经”的意思是“宗教的限制”，即经济的活动要有伦理的限制。具体地说，就是耶稣教的禁欲主义，也即是一种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勤奋工作、为社会服务的伦理。

可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圣经，两只手里都是拿着算盘。除了算盘以外，没有任何规定人的行为的基准。资本主义的精神已变得极不健全，能赚钱就好。资本主义已经不知不觉地完全变了，变得既无伦理也无文化。特别是今天的日本，赚钱已成为国际性的活动，没有任何抑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普遍的赚钱哲学”甚至已成为日本人的共性。实际上支配今天日本人生活的规范，就是“能赚钱就好”。然后是打高尔夫球、唱卡拉OK。在今天的社会里，愈是头脑空空，生活得愈舒服。不能不说这正在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精神状态。

我们应当重新回归到资本主义的原点上去。就欧洲来说，有所谓耶稣教徒的伦理。从日本来说，有江户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所产生的心学。我认为心学是一种“人的伦理”，它综合于儒教、佛教等当时日本的各种伦理，成为一种便于当时民众理解的日常生活中的规戒。当时商人们一手拿着心学、一手拿着算盘来从事经营活动。到了近代，福泽谕吉提倡“近代商人”的道德。所谓要尊重自己的独立自尊的意识和伦理观就是如此。在经济活动中要一只手持着算盘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另一只手里如果不拿着算盘以外的规范、伦理，那就失去了平衡，这应该说

是不言自明之理。我认为今天的日本人需要遵循这一不言自明之理来生活。

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实践“资本主义伦理化”的具体方法，首先是企业要明确提出伦理规范。企业的领导要把“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告诉职员。松下幸之助^①就主张要明确“公司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当时日本人还剩下一点道德心。而现在把道德的遗产都花光了，企业比那时更加没有道德了。所以更加需要有像松下幸之助那样的人。脱离“商人之道”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伦理。

企业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人们要买好的商品，那是因为它有用。也就是说，企业活动并不是只为了赚钱，还在为社会提供效用。换句话说，企业是在追求利益中来完成社会的任务。把公司的这种作用、意义深深地扎根于职员的意识之中，是对职员的极其重要的教育。现在的家庭不教道德，学校不教道德，如果公司也不教道德，那就难免叫人们以为人不需要道德，“公司只是为了赚钱”。

如果彻底贯彻公司并不是单纯营利团体的思想，那就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公司有着伦理上不能干的事。如果公司有着自己的伦理，就会要求职员的行动有伦理。反之，如果认为公司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干，那就不可能要求职员有伦理。

^① 松下幸之助(1894—1989)，实业家，松下电器产业的创立人。

仔细地想一想,现在企业确有丧失了目的的一面。就是说,除了赚钱以外,找不到其他的目的。这和日本国家没有目的有关系。日本虽有“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目的”,但没有作为国家的目的。也许因为日本的企业的实力很大,企业没有思想和伦理性,国家当然也就没有思想和伦理性。但是,这样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正步入一个使我们不得不感到只追求“赚钱”的资本主义是极其危险的时期。

丧失道德所带来的危机

这个问题不仅是企业的问题。今天的日本人正面临着重大的精神危机,那就是丧失了道德。

截至太平洋战争为止,日本把一切的道德价值都吸收到所谓“孝亲、忠君”的忠君爱国的道德里,归纳为“教育敕语”^①。这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西欧,列为市民道德的近代道德,日本却把它集中到天皇所发布的教育敕语里去了。西田几多郎的著作《善的研究》,其任务本来是应当研究所谓的“善”。但教育敕语却认为可以不必研究“善”。理由是:“善”是天皇赐给的,市民社会的道德只不过是天皇所赐给的“忠孝”。明治以后的日本人都被强制信奉了这样的道德。

西田在研究“善”的时候,我想他不会不想到要建立与“忠君爱国”、“教育敕语”不同的道德。但是,西田如果

① 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关于教育的敕语”的通称,规定日本臣民的道德和教育的方针是“忠君爱国”。1948年废除。

在道德上要与“忠君爱国”、“教育敕语”相抵触,就会有教授职务被大棒子打掉的危险。以后西田之所以不太考虑道德问题,沉溺于形而上学的神秘的思辨,我想都是因为这种危险。结果,所谓市民社会的道德终于未能在日本形成。

可是,以昭和20年(1945年)的战败为界,战前的道德——“忠君爱国”、“教育敕语”——变成了“恶”。这种变化本来应当成为市民道德的一个起点。但在现实中却丧失了对道德的信赖感。如果认为“道德是变化无常的”,人也就不太信任道德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这样的道德的变化。我认为他们中很多人都变成了对道德的怀疑主义者。

战后的新道德因此而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由于很多日本人都是对道德的怀疑主义者,所以都不想探求新的道德。战后的日本人或多或少地都是道德的怀疑主义者,所以父亲根本不教孩子道德。这样一来,教育任务就落到母亲的肩上。而母亲也不教。大多数母亲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好学校,能到好的公司里去就职,不用谈什么道德这样难懂的问题,能进好学校,能到好的公司就职就行了。这种思想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考虑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最好是能进好的公司。这也是一种哲学,是功利主义的道德。战后大多数日本人在无意识中都成了极其廉价的功利主义道德的信奉者。

另一方面,学校方面怎么样呢?文部省一说要进行道德教育,日教组^①就出来反对说,道德教育就是国家主义

^① 日本教职员组合的略称,即日本教职员工会。

教育。从日教组来说，实际上是想教给学生否定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道德，但由于遭到家长的反对，因而彻底反对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教育，认为可以把孩子们置于对道德无知的状态，以便于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现在总算有了道德教育的时间，但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道德教育。

因为家庭不进行道德教育，学校也不进行道德教育。于是培养出的孩子根本没有受过道德教育。可以说奥姆真理教事件等就是因此而产生的。那些既不知道宗教也不知道道德，甚至连什么叫人也一无所知的婴儿似的人，一旦接触到什么新奇的貌似宗教的宗教，就轻易地当了它的信徒。而且一旦信了这种宗教，“道德”也就规定下来了，该干什么全由教祖来决定。他们错误地以为那个世界里有什么深刻的精神。由于根本不懂得宗教和道德，所以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它，投入了这邪教的怀抱。

必须要认真地考虑心灵的教育。我痛感到进行人究竟是什么的教育的必要性。最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教育“人不可能独自生存，需要共同生存。和自然共存，和他人共存。”我们在道德上是怀疑主义者，所以在我们的孩子中产生了骇人听闻的人。产生了这种骇人听闻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为了不再继续这样的悲剧，必须从根本上考虑教育的问题。

今天的日本已经出现了道德崩溃所带来的危机的现象。基督教曾经支撑过西方的道德。但在其崩溃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根本不相信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从这些虚无主义者当中，出现了“为了实现社会的正义杀多少人也沒

有关系”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涅恰耶夫事件的刺激，写了小说《恶鬼》。但涅恰耶夫事件的恐怖只不过是奥姆真理教事件的万分之一。比涅恰耶夫事件恐怖一万倍，不，超过一百万倍的恐怖事件，已经通过奥姆真理教在日本发生了。

两者的思想大体上是相同的。这种思想认为：“因为旧社会是腐败的，为了破坏它，干什么都可以。杀人也不要紧，撒谎也不要紧。”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根本不相信道德和宗教的无神论的一种形态。20世纪初在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唯有社会主义的道德正确。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俄国已经丧失了对道德的信赖。这种完全没有道德心的人的存在，将是今后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

这种情况在日本也没有多大不一样。刚才已经说过，日本人虽然没有信仰社会主义，但有着一种近似的思想。而且思想家、知识分子的言论大多倾向于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一崩溃，等于以前的规范、基准都崩溃了，变成一种等于根本没有道德的状态。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否定宗教、否定道德、没有任何伦理规范的可怕的时代。我感到现在日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丧失道德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现在人们都感到迷茫。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只有一条面向“原点”，把立足点放在那里的活路。

在身边寻求“伦理”的源泉

因此就出现了我们究竟怎样来树立“新道德”、“新伦

理”的问题。比如刚才提到的西田几多郎的“善”的观念中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它不可能直接成为企业的伦理或劳动者的伦理。那么应当怎么办呢？我认为只有从“劳动本身就有伦理行为”来思考。所谓伦理并不是在很遥远的地方，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打个比喻来说，老鸟拼命地为小鸟收集饵料带回巢里，我认为从这样的现象中就可以发现伦理。

自己不吃也得让孩子吃，这是生物的基本伦理。这种行为从家庭本位来看，则是一个家庭的利己主义。但从“父母”和“子女”的个体关系来看，则是父母为子女付出了牺牲。比如大马哈鱼要从很远的地方回到出生的河流里来产卵，然后死在那里。这可以看作是大马哈鱼母亲的伦理行为。应当从这种身边可以发现的伦理行为，或者说从“生物的基本”、“人的原点”来考虑新道德。

西田几多郎认为善是在广大的世界实现自我。这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崇高的思想，但有着只有高级的哲学家才能理解为伦理的危险性。我觉得所谓伦理就在身边，是平民反而能够懂得的“真正的伦理”。

我认为“自利利他”可以成为我们一般生活中的“伦理的基本”。如果使用“菩萨道”^①这个词，可能会觉得太难懂。说“自利利他”，则是一般人都在做的事。就是说，把利益给他人，对自己也是喜悦，也是快乐。劳动就是如此。人劳动是为了自己能吃饱肚子。但一般的情况并不是仅仅如此。这首先是为了养活家庭，然后还为了改善社会，

① 佛教用语。佛教中实践自利利他的修行而达到开悟的菩萨之道。

为了使国家富裕起来,劳动中就包含着多层的利他行为。而且,人有时还会把利他放在比自利更优先的地位。举一个浅近的例子,对于父母来说,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吃,而愿意让肚子饿的孩子吃。另外从孩子方面来说,牺牲自己让父母高兴,也可能比自己高兴还高兴。我认为从这样的家庭关系中一定会产生利他心。

关于这种利他精神,在阪神大地震中开展得很活跃的义务服务活动,也可以说是一个事例吧。由于利他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太稀少了,所以通过参加义务服务会产生一种自己的利他精神得到了实践的心情。利他精神会因此而觉醒,所以我认为这是好事。但我不知道参加义务服务的人回到日常生活中将会是怎样。我想参加义务服务的人回到工作单位时,由于给工作单位增添了麻烦,会遭到人们冷淡对待,产生这样的想法,也是由于在日常的生活中太缺乏发挥利他精神的机会了。

在今天的日本,在工作单位究竟有多少可以实现利他行为的机会呢!?在工作单位对利他行为有没有理解和共鸣呢!?人本来是希望发挥利他精神的,但日本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难发挥利他精神的。因此在发生了灾害等意外事故时,我想大概就有了必须要进行义务服务以充实利他精神的机会。如果是这样,就说明义务服务的人们有着在社会上孤立的倾向。其实理想的状况,是许多具有利他精神的人能进入公司,在那里生龙活虎地生活工作。但实际情况我感到并不是这样。

如果家庭、工作单位都不是利他精神的人能够活跃的地方,真正的利他精神就不可能充分地得到发挥。自利

是利他，利他也是自利，所以利他的精神必然会给公司、工作单位带来利益，而认为利他精神是“损失”、“浪费”的想法是错误的。能够牢固地建立利他的伦理规范，利他精神的人在工作单位也能得到赏识和提升，才能形成利他精神的人经常活跃的场所。今天的日本是自私自利的人统治着工作单位，利他精神平常受到排挤，只好采取义务服务的形式来进行利他的行为。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不可能发挥真正的利他精神。

“心灵教育”的三根支柱

在“心灵教育”中，除了道德教育外，还不能忘记创造性的教育。稻盛董事长说“资本主义要有伦理”。除了这种重视伦理的态度外，他还以亲身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多么需要创造性。我感到这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我对京瓷公司的历史不太了解，但其发展的基础，无疑是意想不到的独创性的设想。

日本人在教育中不太重视这种创造性。其结果，非常擅长于引入西方的学术，并加以应用，制造出产品，但不善于在学术中以出人意料的设想创造新学术、创造前所未有的艺术。在实业界也很难制造出立足于意想不到的新观点上的产品。不过，我认为稻盛董事长还是创办了“新的创造性的事业”。

创造性的教育是很难的。如何培养创造性的人，并没有什么入门的指南。让人学习记忆事物并不难，学习的人也容易。但是，如果不朝着在各个领域里培养大批创造性

的个性的方向去发展。日本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教育的领域里，到处都已经发出了“要重视创造性”的呼声。但是，看一看现实，就会明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句话。我的孙子的状况就是不上补习私塾就不像话。不上补习私塾学习就上不了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就上不了好的大学。由于成了这样连锁的关系，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全都用在上补习私塾上了。如果从小学低年级就这么做，那就一点空暇的时间都没有了，创造性显然将会等于零。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外国大学那样的办法好。他们招收大量的学生，然后从中淘汰一部分。

如果继续这样从小就上补习私塾，只进行填鸭式教育，我担心培养的人不仅没有创造性，甚至缺乏感情。我往往发现这样的情况，那些长期为应付考试而拼命学习的人，碰到什么事都不会感动。考试及格了会有些感动，再不会有其他什么感动了。一想到将不断出现这样不会喜怒哀乐、没有道德、没有宗教、没有感动、没有创造性的人，真叫人害怕。

有趣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时也没有出现愤怒、痛哭、自杀的现象。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有剖腹自杀的人。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有自杀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在苏联崩溃时，在苏联国内和东德都未听说过有自杀之类的事，大概是欧洲共产党的上层只想着如何保命，没有时间来愤怒、痛哭。但是，如果是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应当对崩溃感到悲愤。我想这说明了人的伦理性在下降，同时也

是感受性低落的象征。

“心灵教育”另一根不可缺少的支柱是“环境教育”。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整天不学习，在山青水秀的土地上游玩。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和大自然一起游玩”的体验和“共存思想”是有某种联系的。所谓“环境的教育”的观点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说是去洗海水浴，其实因为海水浴场有危险，一般都是在沙场上建造了游泳池，在对面可以看到大海的游泳池里游泳。说是在海里游泳很危险。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把孩子放到这种危险性小的自然模型、“假自然”中去，是很愚蠢的。活的自然可怕、危险。但不接触这样的自然不行。由于害怕危险而避开它，我认为会产生和碰上更大的危险。

还是要把自己置身于真正的自然、活的环境中去，在那里生活。我觉得从这样的体验中一定会产生人的智慧。这不仅限于儿童的教育。通过模拟的环境或学习所获得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在实践的场所学习所获得的智慧，才可以说是真正的智慧。当然，为了获得这种“真正的智慧”，我们也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不能胡乱地去实践。任何事情都是如此。重要的是不忘记“基本”去实行，进行不下去就要回到“原点”上来考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生活在一个迫近界限的时代，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陷入困境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必须要有“回归原点”的自觉。

《回归哲学》读后

复旦大学教授 蒋 凡

在日执教期间，正巧知友卞立强先生翻译稻盛和夫与梅原猛合著《回归哲学》一书告竣，嘱我认真阅读，并希望谈点感想体会。接受这一委托，起初并不特别在意。但是，读着读着，不觉入了迷，反复看了几遍，仔细推敲其精神奥旨，不禁掩卷沉思了起来。书的篇幅虽然不长，却是尺幅具万里势，舒卷自如，在随意自然、轻松活泼的对谈中，寓藏着严肃认真的深邃人生哲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它不仅对日本人，而且对世界读者，其中当然包括了中国人，可说是启迪良多，受益匪浅。作为一位中国读者，我也随着书中内容的展开，逐渐激动了起来。遵照本书译者卞立强先生的建议，现将我的读后感附在书后付梓，以供我国读者参考。

二位作者都是具有世界声望的人物。但其赫赫声名，不是来自权势，亦非依赖金钱，而是以其事业的成功和贡献。二位作者，一是企业家，一是教授、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自由游泳，并以其创造性的开拓，为人

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书中充分体现了二位先生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心向善的诚挚精神。正是由于共同的赤子之心——也就是对于一心向善之“道”的不懈追求，把二位职业很不相同的作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人类应回归到相互关心、和谐共存的哲学原点上，作者的大声疾呼，震撼了那麻木已久的人类心灵，从而引发了新的共鸣。

标新立异，创造发展，这一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类思维中最为活跃的主动精神，是本书精华之所在。作者针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最关心的热门话题，侃侃而谈，而不管这样的议论是否会得罪其行政领导或思想权威，也不问是否会因此威胁到自己的事业、危害到自己的前途。知道得罪人还要明知故犯，作者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抱着对于整个人类安危负责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对自我、家庭或小团体负责，所以能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进一步又言人之所不敢言。人们一旦回归到人关心人、关心环境和与自然共存这一哲学原点之后，就会因其高瞻远瞩而有新发现新创造，从而看清前途，认准方向，一往无前。

在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连锁反应而相继变色。这时，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欢欣雀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欢腾的热闹时刻，本书作者却勇敢站出来说“不”，吹出了相当不协和的音调，许多人听了感到声音非常刺耳。但作者不管世俗的偏见，仍然据理力争，并站在其“回归哲学原点”的理论基石上，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也早已道德沦丧,人成了只知赚钱的动物,“能赚钱就是好”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正在把社会的历史发展,一步步地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潜藏着深刻的严重危机,已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一逆耳忠言,犹如当头棒喝,引起了资本主义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不安、不快,甚至可说是愤怒。二位作者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批判,目的不是否定资本主义,而是想挽狂澜于将倾。但正因为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声音,所以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本质的深刻揭示,也就因其切合实际而愈加有说服力,因而对我们很有启发。在世界上,不管是西方或东方,也不问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探索人类命运、社会前途,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不同肤色人种在不同的时代中共同创造的。作者对资本主义新的严重危机的揭示和批判,正是出于那一心向善哲学之“道”的回归,犹如书名所示,含义精深,令人警醒。

一心向善的道德教育,作者称之为“心灵教育”,非常重要。人的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部分组成的。和古代相比,近现代世界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大幅度地上升,像日本及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部分失业和贫穷,但相对地讲,应该说是衣食不愁,物质生活比较充裕丰富。但因此而有人以为有了钱,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包括玩弄女性,也可依靠金钱的神通,畅所欲为,并认为这就是幸福。但本书作者则指出这种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卑劣,正是其道德沦

丧、精神堕落的可悲表现。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诸如“人活着为什么？”“世界向何处去？”“救世主何在？”之类的问题，看似老生常谈，不知被人们讨论过多少次了。但作者的视角一变，就令人感到面目全新。中国古代著名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规箴》第十则刘孝标注引《管辂别传》，记载了三国曹魏玄言清谈家邓颺批评《易》卦占筮家管辂，讥其解《易》之言是“老生之常谈”，但管辂却自负地说：“夫老生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也。”“老生常谈”指旧面目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不生”、“不谈”则指不常见不常谈的新面目新思想，旧曲新唱，老话题中富新意，令人精神振奋，正可见作者别出心裁之匠心。借用这话来形容《回归哲学》，非常合适。如果仅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而精神匮乏，则作为一个人，是残缺不全的，甚至可以说，精神残废比起物质欠缺更可怕。汉代赋家枚乘《七发》曾讲到公子王孙的物质生活极其优裕，锦衣玉食，洞房清歌，饱思淫欲，姬妾罗前，结果是因其精神空虚，酒色伐性，自致膏肓之疾。今天世俗光是讲“利”，只知赚钱，能骗则骗，别人生死干我屁事，不讲信用和道德，因而人们愤怒地骂他们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话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在中国，其感情的正义性是可以理解的。不讲道德良心，赚黑心钱，最后结果是损人而又不利己，把自己一步步地推向了公子王孙所面临的地狱之门，这有什么幸福可言？这一道德沦丧的现象，在近现代社会中特别严重，是全球普遍的现象。因此，作者针对现实而严肃呼吁“哲学的回归”，提倡利己利人的“商人之道”，很有必要，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稻盛先生是大企业家，但他和思想家

梅原先生一样,反对商人们的卑劣不正的行为,提倡堂堂正正的正直经商。追求利润不是坏事,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获得的利益用出去,……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为了人,……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社会作贡献和进行援助之用”。铮铮誓言,掷地有声,令人感动,但也令人慨叹。光是稻盛和梅原有菩萨心肠是救不了世界的,二位先生因此而希望人人心中都有菩萨,也就是说,救世主不是天主或神灵,而是在人心中,救世之事,人人有责。这就把一心向善之“道”,提到理论观念上来认识,这就是“哲学的回归”之真谛。

有关环境问题,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当前世界共同关心的议论。二位作者,也以极大的热情、精辟的见解来引导广大读者。在世界文明发展中,人从自然的奴隶,逐渐变成了自然的主人,对自然进行了无限制的掠夺,这不是人类的幸福和骄傲,而是通向文明毁灭的危险之路。作者尖锐地指出:“破坏又加上污染,可以说越发加快了人类丧失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应当在大难发生之前尽快敲起警钟,采取对策。”这不是耸人听闻之言,而是发自肺腑的学者良心。地球犹如生养抚育人类的母亲,孩子长大成人了,却不断向衰老的地球母亲胡闹,要这要那,无尽索取,甚至一旦不给,就要打断母亲的脊梁骨,用飞机、大炮、原子弹氢弹,什么破坏和污染都不顾。因为在人的脑海里,“自然是人的奴隶”。由于理论观念指导的错误,因而导致环境破坏污染日益严重。人要吃饭,可是大地受污染。人要吃鱼虾海鲜,可是江河海洋受污染。日本熊本县水俣湾,不就是由于附近化工厂排出废

液,造成人们有机水银中毒,称为“水俣病”,重者死亡,轻者残废,成为公害。人要呼吸空气,可是地球的大气层受污染,臭氧层受破坏,难以阻挡太空辐射对人类的伤害……诸如此类,触目惊心。破坏环境,不就是人类毁灭文明的开始么!我曾到过中国西北的敦煌考察,从西安西行至兰州,经沙漠戈壁滩到达目的地,一路许多荒山野岭,寸草不生,气象萧瑟,令人震惊。敦煌、兰州在甘肃省,古时地名称“陇”,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曾明确记载:“陇西多林木,民以板为屋。”到处森林覆盖,郁郁葱葱,气候温润,适合于人类生活,但是因为人们无限制地砍伐森林,扩大农耕牧场,结果是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人们应该自觉地面对现实,猛醒过来,切实地负起责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尤为严重。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不仅是当地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保护自然和环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环境危机。我在日本生活一年,看到日本纸张的浪费惊人,其消耗量世界第一。造纸及其他经济项目要用大量木材,日本一般并不砍伐本国森林,而是向东南亚或南美国家进口,能说日本没责任吗?其他欧美国家也是如此。只保护好日本、欧美国家的环境,还不足以保护地球母亲。如果一旦中国的海洋大量污染,能不通过太平洋流向日本、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吗?只保护本国环境是不够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自觉负起责任,人人有一心向善之“道”,共同关心和保护地球——人类的母亲!不然的话,天天听到地球母亲在哭泣,你能不心酸吗?

我在这里,只是谈点个人的读书心得。此书之精华风

采，多得不胜枚举，笔者难以传达其万一。但是，高山仰止，敬慕之心，油然而生。自立自尊自信自强，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工作和开拓，使自己在一心向善哲学之“道”的探寻中，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新贡献，并在这一努力奋斗中找到自己的欢乐和幸福。这是我读书所受的启发，并希望以此和广大读者共勉。耿耿此心，撰文以志。

1996年3月24日于日本·京都蜗庐